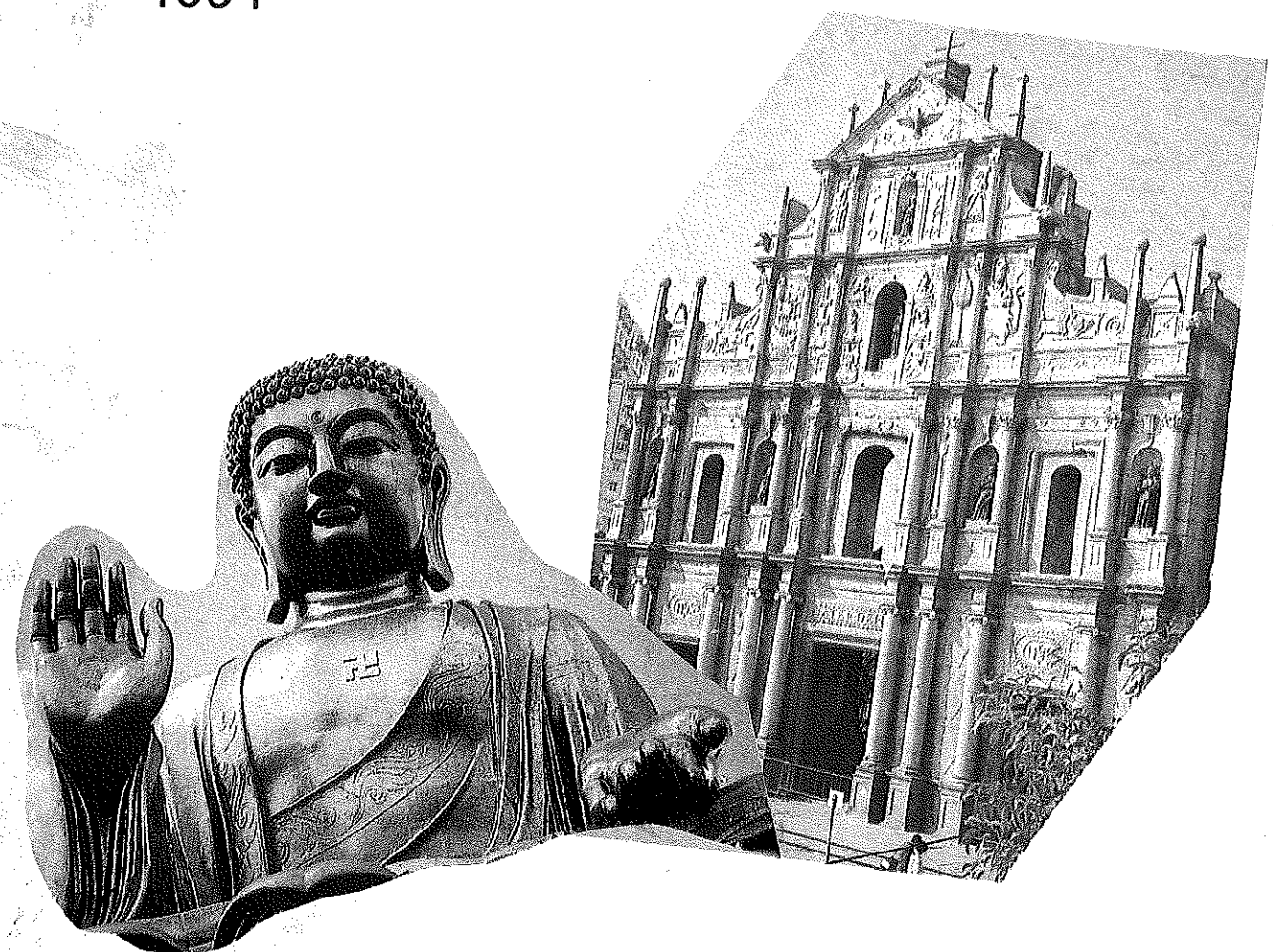




當代港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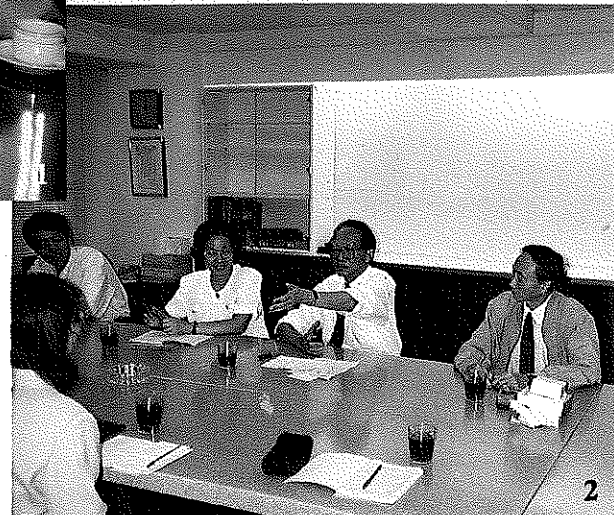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第 2 期
1994



港澳研究中心访问团 在香港

(图片说明见64页)



当代港澳
1994年第二期
(总第3期)

目 录

2/文摘页

- 4/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香港) 谢国梁
9/《金融资本论》与香港的金融资本 郑德良
13/香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值得重视 林江
16/粤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管见 郑天祥
18/利用香港促进广东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雷强 杨经萍
22/“一国两制”与粤港澳经济关系前瞻 郭小东
26/从流动性监管看香港银行业监管的新取向 (香港) 罗文华
29/中国因素与香港股市——对恒生指数破万点的历史透视 朱德新 尚慧然

- 百家论坛 32/历史是一面镜子——谈深入研究澳门历史问题 黄启臣
36/静静地革命——未来香港的路向 (香港) 甘长求

- 社会 38/香港人口的郊区化 李若建
42/短论：论澳门成为百万人口的国际都市 郑天祥

- 历史 43/四十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争执 史言军
46/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在中西科技文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 邓开颂
48/港澳地区史前时代沙丘遗址的分期及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 商志群 李果

- 文化 52/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之现状及趋势分析 陈丽君

- 书评 56/简评《澳门地理》 司徒尚纪

- 港澳档案 58/香港经济简讯 蔡婉华
60/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创设、职能及其运作 常慧君 陆军
62/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成果汇编(著作部分) 朱雪梅

- 63/征订单 64/封二、封三、封底图片说明,本刊启事

主 编: 许锡挥
副 主 编: 郑佩玉 郑天祥 肖贤彬(常务) 孟庆顺(常务)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4446300—6799
传 真: (020) 4429173
邮政编码: 510275
出版许可证: GD—1152
刊 期: 逢6月15日 12月15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1994年12月15日
定 价: ￥4.50元

本刊声明

-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请勿擅自转用。

文 摘 页

谢国梁：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自内地改革开放 16 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逐步深入，两地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双方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投资伙伴；金融层面上的合作已扩展到大部分金融领域，如集资与信贷、货币过境流通、互设金融机构、互相参与股票、证券市场投资以及外汇市场的联系等等。随着与内地经贸、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香港经济不断从中受益，香港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展望未来，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前景仍然广阔，一些问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郑德良：《金融资本论》与香港的金融资本

吴大琨教授主编的《金融资本论》是九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根据已经变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对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科学地、客观地进行新的探讨之作。本文作者借题发挥，也对东亚地区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香港的金融资本的特殊形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林江：香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值得重视

近年来，由基础金融工具衍生而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衍生金融工具已呈现出种类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参与者增多的状况。本文分析了香港衍生金融工具发展的原因，对其操作、管理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郑天祥：粤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管见

粤港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各自为政，此情况现已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且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粤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应成为今后的主流，粤港基础设施现均处于饱和或趋于饱和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粤港合作、配合，可成立粤港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半官方的大型基建协调管理委员会及两地政府属下的粤港基础设施规划协调委员会等实体组织，具体研究及协调两地基础设施的建设。

雷强、杨经革：利用香港促进广东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加速实现经济国际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广东在开发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方面迅速发展。然而，现阶段广东跨国企业的现状还处于较低水平。利用香港的国际地位开发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将是广东捷足发展国际业务的巨大优势。通过选择开发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正确方式，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广东的跨国企业必将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优势。

郭小东：“一国两制”与粤港澳经济关系前瞻

“一国两制”的实施，对将来粤港澳经济关系影响甚大。“一国”的实现，即主权的统一，将有力地推动粤港澳经济关系在现有水平上的进一步发展；“两制”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粤港澳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起到限定作用，亦即要求这种发展必须是在确保“一国两制”政策的有效施行的前提下进行。粤港澳经济关系的发展，仍将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

罗文华：从流动性监管看香港银行业监管的新取向

1994 年 1 月 24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个更全面监管流动性的取向》的指引，这是监管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改变了过去香港银行监理处单单依赖流动比率这一指标来决定一间银行是否符合最基本的流动性要求的做法，而采用一系列兼顾质量与数量的因素，去衡量一间银行的流动性是否足够。新的监管制度将有助于银行提高管理水平，亦将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在一个更为健全的环境

境下运作。

朱德新、尚慧然：中国因素与香港股市——对香港恒生指数破万点的历史透视

1. 大陆深化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巨大的界外效益；2. “中国概念股”热不断刺激港股活跃；3. 外资涌入香港股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好大陆经济；4. 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将“政争”对股市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限度。预计中国因素对香港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增无减，香港作为大陆筹集外资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英方挑起的“政争”对外资影响不大。

黄启臣：历史是一面镜子——谈深入研究澳门历史问题

澳门史的研究是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四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澳门史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果的研究，可资今人进一步研究的鉴借。但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历史，发挥澳门历史的功能，还有几项亟待从事的工作：搜集整理澳门史料，开展澳门史的系统综合研究，着力研究澳门史的重点和特点。

甘长求：静静地革命——未来香港的路向

美国资本家约翰·洛克菲勒主张进行“第二次美国革命”，以革除当代社会的弊端。香港同样需要这种革命，即非暴力的、静静的革命，以消除她的阴暗面，使她的光明面更加发展，使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健全。

李若建：香港人口的郊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面临着市中心人口规模恶性膨胀，住房高度紧张的困境。通过徙置区的建设，香港缓和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并把人口从市中心移到市边缘。通过新市镇的发展，香港比较成功地控制住老城区人口的增长，使人口逐渐向郊区流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在解决城市人口问题时借鉴。

史言军：四十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争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两国政府曾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过谈判，但以中国的让步而暂告结束。抗战胜利后，香港日军的受降权又成了中英双方争夺的目标，结果以英国获得而告终。本文对上述过程作了披露和深入的分析。

邓开颂：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在中西科技文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

澳门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体现在：首先，它是西方科技及人才传入中国的入口。其次，它是向内地输送科技知识和人才的大本营。第三，它是中西信使往来的中继站及西方传教士被逐出中国的流放所。上述地位和作用由下列因素造成：1. 澳门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多种途径的汇合点。2. 明清政府视澳门为“特区”，采取各种特殊政策。

商志谭、李果：港澳地区史前时代沙丘遗址的分期及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

香港考古工作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70 年代后进入发展时期。在港澳地区史前时代沙丘遗址及含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期问题上，学术界形成了多种不同看法。出现这些分歧是由于遗址的内涵较复杂，地域性较强，外来文化及生态影响较大，而资料与研究工作的深、广度均嫌不足。有鉴于此，目前宜于对遗址进行大略而非详细的分期。

陈丽君：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之现状及趋势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很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珠江三角洲人逐渐摆脱盲目追逐香港文化的倾向，有选择地吸收借鉴香港文化中的精华。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祖国，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将趋于加强，两地文化相互影响及相互合作也将加强。珠江三角洲人应当在吸收香港文化精华及摒弃其糟粕两方面做出努力。

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 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香港) 谢国梁

一、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合作的回顾

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 16 年前仍然基本上局限于一些进出口贸易, 其余合作几乎谈不上。但自一九七八年内地对外开放之后, 彼此的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一时期,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较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从七八年至八三年。这一阶段是内地开放初期, 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是: 港商对内地的投资以制造业为主, 规模较小, 双方都在试探摸索; 内地出劳工、土地, 港商出资金、技术、管理, 属于较典型的生产要素互补的合作。

第二阶段, 从八四年至九二年初。八四年起, 香港和内地的市场获得了突破性的改善与发展: ①在香港, 中英两国政府于八四年底签署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使香港前途明朗化, 投资信心开始恢复。②在内地, 八四年初, 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厦门特区, 总结了特区的宝贵经验, 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发展, 进一步明确内地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八四年五月, 国务院作出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 内地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因此, 从八四年下半年起, 港商对内地的投资开始从试探性转趋踊跃, 大财团也开始进入, 投资层次逐渐提高, 范围也从较单纯的制造业发展到其它领域。经过 8 个年头相对稳定的发展, 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逐渐发展成香港最重要的产品制造基地, 香港则成为内地产品的市场窗口并逐渐成为内地商业、金融服务中心。两地合作从初期的生产要素提升到产业

互补。

第三阶段, 从九二年初至今。九二年初, 小平同志再次南下深圳, 发表南巡讲话, 强调将加快内地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也决定把上海浦东辟作新的经济特区, 加快上海的发展, 以带动整个华东地区。在此鼓舞下, 香港的大财团开始大举进入内地, 与国际资本争抢市场, 投资重点也开始转向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领域, 内地市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 两地的经济趋向一体化。

经过近 16 年的发展, 香港与内地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已十分密切, 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在贸易、投资层面上:

1. 最大的贸易伙伴

有形贸易方面, 目前香港和内地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九三年的有形贸易总额达 957.5 亿美元, 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 34.9%, 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 49%。出口方面, 九三年香港对内地出口货值 437.2 亿美元, 占香港出口总值的 32.3%, 内地是港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而内地对香港出口货值达 520.6 亿美元, 占内地出口总额的 37.5%, 香港也是内地最大的出口市场。

无形贸易方面,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客源, 也是外国人进入内地投资、旅游的通道。九三年, 香港居民进入内地的人次超过 2300 万, 较七八年增加 15 倍; 从内地来港旅客 (包括外国旅客及内地旅客) 人数则达 170 万, 但 16 年前这一数字是非常之小的。

此外, 九三年来往两地的客、货车辆达 740 万次。

2. 最主要的投资伙伴

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至九四年上半年止, 港商在内地的累计投资总额达 475 亿美元, 占内地所吸引外资总额的 62%,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酒店业、房地产, 基础设施的投资近几年也有明显增加。至九三年底, 估计有约 80% 的本地厂商将生产线迁到华南, 设立了约 25,000 家工厂, 超过 5 万名香港技术管理人员在华南工作; 而华南则有约 300 万雇员直接或间接为港资企业提供服务, 相当于香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5 倍。

另一方面, 内地对香港的投资近几年也在快速增长 (最近, 市场流传一个数字, 估计内地对香港的投资额已累计至 200 亿美元), 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外来投资者。目前本港中资企业协会成员达 1000 多家, 经营的领域包括银行、贸易、批发、零售、运输仓储、房地产、制造业及基础工程等等。在港中资企业中, 有不少实力雄厚的大集团或上市公司, 对香港经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金融层面上:

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 带动了内地金融方面的交往和合作。在八十年代, 两地的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香港作为内地在海外融资的主要市场上, 香港银行为投资内地的港商直接提供贷款或安排银团贷款。但近几年来, 两地合作的层次已大大提升, 合作的范围已扩展到大部分金融领域。

1. 集资与信贷

香港一直是内地在海外筹措银团贷款的主要市场。八十年代, 对内地的银团贷款, 有 80 亿美元是在香港安排的。进入九十年代, 对国内的银团贷款逐年大幅增加, 九三年的总额达 67 亿美元, 其中多数是在香港安排的。香港银行对内地银行和企业的贷款从八三年的 935 亿港元, 增加到九三年的 1948 亿元, 对内地贷款总额占香港对境外贷款总额的比重, 也从八三年的 1.7% 升至九三年的 4.9%。

另一方面, 由于内地经济发展及港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香港资金大量涌入内地, 这些港元资金

多数由内地银行系统回流香港。这反映在香港银行对国内银行的港元借贷净额, 八八年开始由净债权变为净负债。这一净负债额在近两年平均保持在四、五百亿元左右, 成为香港港元同业拆借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这一净额的变动, 亦对香港同业市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2. 货币过境的流通

由于两地经济交往极为密切, 货币越境流通已相当普遍。据估计, 目前在内地 (主要在广东) 流通的港钞约有 150 多亿, 相当于港钞总流通量的四分之一。去年中国允许旅客出境携带 6000 元人民币后, 估计每年有 100 亿元左右的人民币在香港兑换。货币越境流通, 是两地金融融合的一个实体表现。

3. 互设金融机构

香港与内地银行互设机构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 已有 13 家银行在内地开设了 27 家分行、19 家代表办事处以及一些合资银行和财务公司。其余的香港银行也在申请或有计划到内地开设机构。同时, 目前外资银行在内地设立的二百多家代表办事处和七十多家分行, 多数是由驻香港的机构领导和协调的。因此中国业务在整个香港银行业务中的比重已大为增加, 并正在继续上升。另一方面, 内地银行南下香港也有明显进展。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以及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都从去年开始陆续在香港成立了代表办事处。去年以来, 内地银行以及商业机构还在香港收购了四家本地银行的相当部分股权。这些中资背景银行为香港银行业注入了活力。

4. 互相参与股票、证券市场投资

证券市场是香港与内地金融往来的新领域。近几年, 在香港股市上, 与内地有关的股份不断增加, 相继出现了以内地作为主要生产基地、销售市场或盈利来源的“中国概念股”和所谓“红筹股”。红筹股包括在香港注册但由中资控股的上市股份以及国营企业直接来港上市的“H 股”。去年以来, “H 股”在香港市场成功上市, 体现了两地证券市场的合作成果。第一批 H 股已全部顺利发行, 第二批 22 家国营企业也已开始在港发行股票上市。迄今, 在

香港股市上,中国概念股和红筹股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这些类型的股票的增加,这一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与内地有关的香港上市公司,并不只中国概念股和红筹股。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香港上市公司都在内地有投资贸易或其他业务。因此,香港股市成了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的主要市场。近几年,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兴趣,在内地股市处于发展初期、市场条件与规范仍待完善的背景之下,国际投资者以投资香港股票作为分享内地市场的手段。

香港银行和证券公司对内地证券市场的参与为境外机构之首。目前承办内地 B 股发行的主要是香港的银行和证券机构,而进行 B 股交易的外国投资者也以香港为基地。最近,内地有意准许外金融机构参与 A 股市场,已有多家香港机构捷足先登,与内地机构组成合资公司准备参与。

香港的中国基金近两年发展迅速,目前主要以投资 B 股为目的,但随着基金管理人内地认识的加强和内地投资市场的改进,中国基金的投资对象将会逐步向非上市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基建等项目投资,以及向直接入股企业等多元化方向发展。

5. 外汇市场

在外汇市场方面,香港一直是内地外汇交易的主要市场之一。人民币汇率并轨后,人民币汇率开始向市场化和自由兑换发展,今后,内地外汇市场与香港外汇市场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两地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今年七月,中银集团香港外汇中心已与深圳外汇经纪中心联机,这是内地外汇市场首次与香港外汇市场实现电脑联机。这一合作,有利于深圳外汇市场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也有利于香港外汇市场的扩展。

迄今为止,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合作,超过了日本在东亚地区展开的一些合作,也超过了新加坡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这一地带可以说是目前亚太区一个关系最密切、且成效最突出的经济合作区。

二、香港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中国因素的作用

八十年代后,随着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香港经济不断从中受益,整体经济、金融实力与国际金融地位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转口贸易、运输、旅游以及各类商业服务中心;发展成亚太区最重要的中转中心、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目前,香港已是世界上最富裕及著名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至九三年底,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8,500 美元,名列世界第八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九三年,香港的有形贸易总额达 2,716 亿美元,在全球排位第 10;但出口总额 1,341 亿美元,在全球排位第八。

——股票市场方面,八七年,只有 266 间公司挂牌上市,平均每日成交额 15 亿港元,在世界仅名列第 15 位。至九四年八月底,上市公司增至 513 间,每日成交额上升到 52 亿港元,市场总值达 25,050 亿港元,成为世界第七大证券市场。

——外汇市场方面,国际清算银行于九二年四月份所作的四年一次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外汇市场平均每日交易额为 610 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港口运输方面,九三年,香港的货柜码头总共处理了 920 万个标准货柜箱,是世界吞吐最大、最繁忙的货柜港。

——旅游方面,九三年到达香港旅游或中转的旅客总量达 890 万人次,其中 720 万人次从国外抵港,170 万从内地抵港,香港依然保持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和中转地。

香港近十几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影响及支持有重大关系,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主权,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

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政府根据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极大的魄力与远见和英国政

府达成并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时平息了当时市场出现的信心危机和动荡,使香港政局恢复稳定,前途重现明朗。“联合声明”的签署给香港在八五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蓬勃创造了动力、环境和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2. 内地是香港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市场

贸易是香港经济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从八十年代开始,内地市场对香港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逐年上升,香港与内地市场的贸易总额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一九八〇的 15% 逐步上升至九三年的 35%。就转口而言,内地市场是香港转口贸易的最大的需求者和供应者,九三年,香港 88% 的转口货值与内地市场有关:转入内地市场或转出内地市场。

在无形贸易方面,九三年,到内地的外国旅客便有 200 万人次路过香港,而从内地到香港的旅客总数则达 170 万人次,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无形贸易收入。

3. 内地成了香港最大外来投资者

近几年,内地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建立的各类公司,成为香港市场最重要的投资者;在港中资企业也不断壮大,成为香港经济稳定、繁荣一股最主要的力量。

4. 内地市场成了香港吸引外资留港或继续来港的最主要因素

香港的经济金融经过多年繁盛发展以后,由经济成熟与转型等因素引致的问题正在威胁其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这些问题包括:持续的高通胀、高租金、高工资和人力资源的短缺等。这些不利因素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亚太地区多个金融中心的竞争,尤其是头号对手新加坡的竞争。一些跨国公司和银行已开始将地区总部或一些部门迁往新加坡。目前可以抵消香港这些不利因素的最主要因素是香港具有作为国际资金投资中国的主要基地这一独特的优势,这一因素使大多数外资公司留港或继续来港。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与内地有关的经济活动提供服务。

5. 内地市场成了香港银行业拓展业务、发展壮

大的重要基地

香港的银行业在经历近年的高增长后,经营环境已开始转变,经营难度正在增加。香港本地的银行业务竞争日益激烈,市场已趋饱和。息差缩窄,存款不足、贷款受控、成本上升等因素已开始侵蚀银行的盈利。香港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向,除了继续提高效益和业务多元化外,主要的发展空间是开拓内地业务。一些本地银行的内地业务现在已占其业务总额的 10% 至 15%,计划三、四年后将比重提高到四分之一以上。香港银行除了在国内增设分支机构外,近年还逐渐将一些后勤部门迁往国内,以及聘用国内员工,藉以减轻香港的高租金和人员不足问题的负担。这些都显示了内地市场对香港银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6. 内地企业进入香港,改善和增加了香港股市的结构、实力

在香港股市方面,中国成分的增加明显地对改善香港股市的结构和增强市场地位有利。香港股市行业结构较为畸型,地产股、金融股比重偏大,而工商实业股比重偏小,特别是缺乏大型工业股。国企股在港上市,既改善了股市的结构,也扩大了股市的规模,这对香港的股市从地区性股市走向国际性主要股市将起重大作用,今后,香港股市实力的扩展,仍有赖于来自内地企业的上市。

三、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合作前景

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如何,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很高的探讨价值。目前,香港、内地有许多机构、学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香港工商业专业联会去年三月份便以《香港廿一》为命题向社会公布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香港廿一》对香港未来将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一些前瞻性探讨,是一项颇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香港与内地经贸、金融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两地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都产生了推动作用,两地都因此得益非浅。但双边资金流动和业务往来的增加,也

同时带来一些问题,包括两地法规、基础设施等软件与硬件方面的协调与衔接;一方的变化和波动,对另一方的影响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与两地在十多年来的合作中所奠定的基础相比是次要的。香港与内地今后的合作前景仍然十分广阔,主要发展趋势是:

1. 香港与内地的产业合作将逐渐深化。

由于比较成本的关系,香港的制造业向内地尤其是华南迁移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这对两地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①香港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本地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中占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产值的比重已从八四年的 24% 降至九二年的 13%,就业人数的比重则从八四年的 37.8% 降至九三年的 22.6%,估计这种下降趋势今后仍会持续下去。

②由于企业实力、生产成本及政府的政策等因素,香港的制造业要在本地发展高科技的可能性已比较小,迁到华南地区的产业也已无法回头。因此,香港的制造业今后将主要利用内地技术力量、生产资源在当地进行产业升级;香港本地则逐渐演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而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在大量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及管理之后,轻纺工业的力量将大大增强,并在其经济中占显著地位。

③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层面将由目前的产业互补与合作向经济一体化发展,彼此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密不可分,连在一起。在这一层面上,两者的分工大致是:华南主要从事产品制造;香港主要提供与产品产销有关的商业性服务,如:开拓出口市场及产品创新、提供港口及转口运输服务,为内地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类集资渠道及金融服务等等。当然,华南不会因此成为一个大工厂,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区内的若干中心城市也会大力发展金融及服务业。

这种更深层的合作,必将给两地带来更大的比较利益。

2. 金融领域的合作将加速发展。

目前,香港与内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尚停留在较初步阶段,未能满足港商在内地的投资及本地金

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①迄今为止,香港的银行业只在内地的部分中心城市开设分行或办事处,所能提供的业务品种仍然有限,未能跟进配合众多港资、外资企业在内地的业务发展。现时由外商在内地的投资所产生的各类银行服务需求已越来越大。②内地的三资企业发展快速,许多已具备上市条件,有到香港上市的强烈愿望。两地证券界在这方面虽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目前的进程似未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③本地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份额早已相对稳定,香港银行业本身有进入内地市场寻求新发展机会的愿望。可见,香港与内地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已十分迫切,需要与内地在融资信贷、企业上市、证券投资等方面的合作获得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3. 香港与内地加强合作,虽然有竞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

从香港的优势看,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是不断强化其作为国际金融与服务中心的功能与地位,为内地尤其是华南,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金融、通讯、运输以及各类商业服务。但内地本身也有自己实力雄厚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也在致力建成华东、华南、甚至更大范围的金融服务中心,今后香港将不可避免要面对这些城市的竞争。

与内地中心城市相比,目前,香港在软体和硬体设施方面均占有较大的优势,短、中期内作为外国投资者进入内地市场的“跳板”地位将不会改变。内地中心城市的确崛起,对香港目前的业务会有一定的分流作用,但对香港的发展不会构成威胁。长期而言,香港目前的竞争优势能否一直保持下去,则要看香港本身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能否进一步发展;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能否较好地克服;港英政府撤退前如何确保联汇制度的稳定、财政实力的健全,使香港目前的国际金融地位得到巩固、加强;软体与硬体设施的建设能否更上一层楼;所提供的各类金融与商业服务能否不断创新;以及能否在经济功能上尽量避开与内地的中心城市重叠,保持自己的发展特色。

[责任编辑:李焱]

《金融资本论》与香港的金融资本

郑德良

一、吴大琨教授与《金融资本论》

最近吴大琨教授托人从北京给我送来一本由他主编的新作,书名:《金融资本论》^①。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 28 万字,可是印数只有 2000 册。

同香港或广东一些畅销书比较,该书从封面设计到印刷纸张都显得比较“落伍”,不过在今天条件下,象这类专业著作,能出版就已算不错了。

从吴大琨先生亲自撰写的前言中,知道该书的作者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包括现任副校长杜厚文教授、马列主义发

展史的几位教授和吴先生的高足章星博士等。据我所知,同五、六十年代不同,这批专家大都是先后在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深入考察研究,现在又因工作或长期专事学术研究的有利环境,经常有机会同国际一流的西方学者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由他们共同撰写的专著,既不会是五、六十年代那种马克思、列宁的片语只字的教条主义解释,更绝不会是自我封闭的说教。吴大琨先生今年已是 79 岁高龄了,除了

有时生病外,他还继续坚持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去年人民大学为他庆祝执教 50 周年过后,他还坚持带博士研究生,并积极从事专业理论研究。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辈自然肃然起敬。他在前言中说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科学理论是决不会过时的。不过,从本世纪初至今近一世纪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的金融资本无论在结构、运行机制和国际扩张方式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展示出其新的特征。对于这些新现象、新特征,我国的经济理论学术工作者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下决心写一本至今在国内还没有的关于金融资本的专著,是他和在他指导下的专家们的一种高尚追求和应有的义务。这大概是前一段北京展开的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争论的一个回答吧!

本书的出版,尽管发行数量不多,也不是人人都需要去读它,但是从学术基础理论建设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需要来看,其意义都不可低估。

本人早年求学时代曾从师吴大琨教授多年。据我所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吴教授从美国执教返国不久,他就发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的论述,在战后已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现象的条件下,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探讨。可惜由于那个年代学术论坛也同其他领域那样弥漫着的不正常气氛,使他没有办法就此继续进行下去,本人在那个时候已进行多年的关于美国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也被迫束之高阁,今天看来实在感到可惜。

时隔 30 年,我们整整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固到改革的历史年代。我国的学术理论工作者也逐步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得到了思想解放。事实上,邓小平同志作为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也希望人们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对国内外一些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更多的学术探讨。

二、从《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到《金融资本论》

吴大琨先生是我的恩师,但我更敬佩他的理论勇气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记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前的 1978 年 4 月,当他在北京图书馆新书展出中读到由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英文版)一书时,他立即被书中所谈到的几个带有“爆炸性”问题的论点所吸引,当即组织了几位青年人着手进行翻译出版。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到 1981 年 1 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仅为“内部发行”,印数只有 6600 册。当我于这一年的五月到北京出席国务院召开的两省及特区工作会议时,曾抽空到他府上探望,刚好样书送到,我当时仅出乎对师长的尊敬,请他送我一本,他立即举笔留书相赠。返广东后,说实在,我一直没有时间认真去读它。大概相隔五年后,当我在香港不断听到有人说“一国两制”的政策构想缺乏理论支持,因而不可能如是实施时,就强烈感到,象我们这样一些较集中研究香港问题的人,必须作出坚定的回答。当我着手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虽然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但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又的确没有关于香港这样一个特殊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仅从一般哲学理论和方法去作出解释,又觉得难以令人信服。不过我在学生时代已经读过一些马克思关于殖民地及其历史地位的论述,但香港又不是一般含义的殖民地。正当我在这段时间陷入理论的迷惘时候,环视我的书柜,不觉翻动了收藏多年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开始时,实在并不易看懂,但在初读了一遍后,脑子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当我反复读过两三遍后,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许多精辟论述,在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来得及发表,以后也没有及时进行系统的整理,以至引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误解。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并没有被第三世界的后继者认真结合本国的具体历史和社会经济实际状况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例如,欧洲各国的情况与被称为亚细亚的东方国家就有很大区别。而恰好东方国家却成功地在本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着手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些基本上是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东方国家如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无法回答的,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做。这本书给人极大启迪之处在于,作者大声疾呼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历史地、全面地了解马克思

思有关上述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结合本国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回答,否则就不是真正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这与我们提出的解决“九七”后香港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沿着该书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很快发现,中国内陆地区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前,虽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但在沿海地区却有一些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割据的殖民地资本主义,那里工商业比较发达;1949 年后内陆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生产力水平仍相对较低。事实上一个国家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早已存在,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要经历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简单地改变这些地区殖民资本主义制度对整体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在主权问题解决后,不但要让其继续存在、发展,而且还必须加以充分利用。通过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地区,可更好地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从这个思路出发,我连续在《中山大学学报》、《广东社会科学》和《特区经济》^①发表了三篇关于为何要实行“一国两制”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的长篇论文。这些都是 1989 年以前的事了,但今天看来,这的确对于我关于香港问题,以及香港与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关系方面的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客观上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吴大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学术推导作用,仍然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他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及在社会上的至尊地位而变得僵化、老朽。

至于他最近送给我的《金融资本论》,也与《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一样,使我同样感到该书给人以重要学术启发。

首先,该书同《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那本书一样,对当代问题的探索也有极高的可读性。

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经济学术理论工作者对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并不陌生,可是在列宁以后,特别是经过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这些在上个世纪末发展极迅速的发展趋势方面是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美、日、德等国,虽然同属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是由于各自的工业、文化历史

背景不同,是否在发展形态上又有些什么区别?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善于同那些转向海外发展的跨国金融资本打交道,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象这些当代金融资本发展的新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这 15 年实践中已有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来,大批西方跨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可是相应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见。诚然,我们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已注意到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趋势,例如对经济一体化、市场发展多元化,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冲击等一些重大问题已有不少新的探讨,但是作为金融资本主体的垄断性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急剧崛起,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出现等一些基本问题研究,不是被忽视了就是还来不及系统的深入研究。记得 10 多年前,学术论坛上曾经由国人滕维藻教授主持出版过《跨国公司》一书,但今天看来,该书显然没有完全摆脱五、六十年代那个不正常年代的学术气氛的影响,西方跨国公司的形象还给人留下浓厚的政治历史痕迹。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早就改变了对跨国公司的态度,从对抗转向合作。在保持主权独立的条件下哪些国家引进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越多,其经济发展成就越显著,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吴先生等各位专家用科学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探讨。

例如,该书在第二章谈到美国金融资本的概念和结构的变化时,明确认为,金融资本概念需要拓宽,美国金融资本的控制形式也从过去的金字塔的垂直结构向网状式的联合控制结构转化。战后美国的一些显赫一时的大财团已经瓦解。作者认为,与其还用“财团”的概念来称谓今天美国那些大垄断资本的话,不如用“集团”更能准确反映这些大垄断资本的结构特征。几天前,刚巧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密执安大学副教授黄亚生博士到访广州,我就此即席请教其看法。黄博士认为,过去我们常说的美国八大财团,事实上经过 30 年代的大萧条及战后的冲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推动下,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过去的摩根财团,除了保留一个摩根名称外,早已变成了两个业务不同(近

年又趋于同一领域扩展)的公司集团。其中有一个最近大家熟悉的摩根士丹利证券集团(另一个是 JP 摩根)。据说,传统上由一二个家族控制的美国超级财团能保留下来已微乎其微了。更多、更普遍的是那些通过相互参与的企业联合。在管理上也不同于过去那种“大锅饭”体制,而是有点象我们今天还在继续推行的那种“企业承包”制。虽然垄断资本还广泛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获取垄断利润,但更多的是以其竞争的优势争取利润丰厚的国家订货。所以吴大琨先生在前言中说:“撇开私人垄断,孤立地研究国家垄断,就不能解释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不能解释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时兴时衰和混合兼容,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迁。”^②

类似的新现象,在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也相继出现。战前统治日本的“财阀”和德国克虏伯这样的资本财团,也分别被巨型的综合商社和大集团联合而组成的新控股集团所取代。传统上银行在金融资本中之核心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这些变化,今天实在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金融资本论》只是在这个重大学术领域上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使人感到有新的学术空气。仅这一点,就很值得有关方面专家注意和研究。

我这么说,是由于这只是一本关于某一方面问题的专著,不可能对所有这方面的问题都作出精细的考察分析,例如关于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那里的资本财团也正在迅速崛起。尽管从其规模上来看,同西方国家那些经过上百年发展历史的超级大资本集团比较,可能还属于次一级的资本财团,但是这些大的资本财团在当地及地区中的经济地位和影响不可谓不大,也有必要在此略加讨论。

三、香港的金融资本

相对于西方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来说,香港是否存在列宁说的那种金融资本?如果有的话,那么它有什么特点?我想回答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现今在香港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汇丰银行金融资本集团、怡和财团、嘉道理财团、太古财团以及华资的长实、新鸿基、新世界、会德丰、

合和等财雄势大的资本财团，从集中和垄断的规律来看并不亚于西方早期那些财团和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控股集团。这些资本财团或集团控股公司，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集团或财团的崛起也是从生产过程的集中开始，在一个经济或产业领域内也已占据垄断地位；其次，他们的成功崛起也是依赖银行的参与和融合发展；第三是这些财团或资本集团都同国际资本有着广泛的联系，世界各地中不少境外公司也是来自香港的资本输出，香港在印尼、越南、台湾、泰国、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美国、澳洲的外来投资中占居前列地位。相应香港财团或集团的首脑，也在国际财经界中地位显赫。那么，香港的资本财团或集团究竟是否还有其自身的特点？我想，这是很明显的。

1. 香港的财团或集团产生和成长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别于西方国家。众所周知，香港不是国家，只是一个英国控制的特殊区。因此，英资财团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其垄断程度更高，产业控制更集中。而新崛起的华资财团，是在强大的竞争压力和垄断的缝隙中成长的，彼此力量的消长是竞争的结果，也同香港经济的特殊类型有关。

2. 香港的金融资本构成，同西方的金融资本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是在工业成长基础上与银行融合发展；而香港在工业规模小、企业分散的条件下，不可能控制银行；相反却高度依赖银行才能生存发展；真正有可能与银行资本融合发展的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地产资本。因此，香港的金融资本虽然象列宁说的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并已形成了垄断，但这种垄断并不是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一起形成的，而是在少数不动产资本的高度集中控制基础上，银行金融机构的广泛推动参与下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资本。以不动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与银行业的广泛结合或互相参与下形成的香港金融资本，是香港金融资本的一大特征。除此以外，香港的金融资本也有象汇丰那样的银行金融集团，它们除了广泛参与不动产的融资外，还靠分支机构的扩展和通过收购合并方式控制其他银行、企业而形成超级银行集团。而嘉道理、太古这样的财团则是在一个行业高度垄断基础上，透过网状式的联合控制而形成的。由此可见，香

港的金融资本，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及经济成长的其他特征，使其在结构形态上更趋于多样化，在整体形态上是介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与日本庞大的综合商社复杂金融资本结构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金融资本。

4. 这种特殊形态的金融资本，也表现在既有大量传统的家族控制的核心财团，也有由分散股权而形成的非家族集团的联合并存。由于历史和东方文化传统影响，迅速崛起的大量华资财团，其控制中心仍然是传统的家族。例如包玉刚家族及其财团，在包氏在生时，包氏的航运、地产王国是他一人独管的天下；辞世后，庞大的家族财团便以其女儿为轴心，分成四大族系财团。一些庞大的华资家族财团，即使创始人去世后，其资产不作更大的分割，但也是由其子女直接继承发展，只是这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而已。这种情况英资的太古、嘉道理也一样。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将香港的金融资本结构形态称为财团。不过汇丰集团则有些不一样，汇丰虽然在香港银行金融领域内占据垄断地位，但在股权结构与控制上，则有别于一般的家族财团，它是利用大量发行公司股票和兼并及业务扩张的方式形成垄断，理论上谁也不可能控制汇丰，但鉴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汇丰还是一家海外殖民地银行集团。怡和财团的情况更特殊，它不仅是典型、老牌的殖民地家族财团，而且还是一个互相控股的庞大集团。因此它不仅同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同殖民当局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既要对广大分散的小股东负责，也要对家族负责。

以上只是在吴大琨教授的《金融资本论》一书的启发下，联系香港地区的情况作出的一些初步思考，实际上真正要揭示香港的金融资本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还要作更详尽、更深入的考察研究，绝非一篇短文就能解决得了这个大问题的。

注释：

①吴大琨主编、张帆副主编：《金融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

②该三篇文章均见中山大学出版社：《香港经济增长特征》，1988年，第一章；《香港经济发展与文化》，1989年，第五章、第六章。

③参见《金融资本论》前言。

〔责任编辑：许锡辉〕

香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值得重视

林江

近年来，由基础金融工具衍生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衍生金融工具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据估计，到1993年底，全球未清偿金融衍生合约的名义值已超过1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最大的六家银行美林、所罗门兄弟、摩根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信孚的衍生合约值达7.2万亿美元，出现交易集中化的趋势。衍生金融工具迅速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八十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不少国际性商业银行客户锐减，同时，金融监管的放松（De-regulation）使许多大企业转而通过直接融资方式筹措发展资金，结果导致银行资产负债不断缩小，零售银行业务的存贷利差显著缩小。为了满足大机构客户的需要，银行纷纷推出衍生金融产品，并且通过杠杆比率极高的自营交易去赚取巨额利润。以美国信孚银行为例，该行1993年底的衍生合约名义值达1.9万亿美元，表内资产（In-Balance Sheet Assets）达920亿美元，股本45亿美元，自营交易的营运收入16亿美元，超过其利息收入13亿美元。亚洲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交易从1985年底占全球衍生工具交易比重的0.5%急升至1993年底的10%，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30%。香港作为亚太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衍生产品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多元化

由于香港金融业发达，基础金融工具门类齐全，故金融衍生产品也层出不穷。目前香港各种主要的基础金融工具差不多均衍生出产品，包括期货、期

权、掉期等。例如，由股票市场衍生出来的产品除了于1986年推出的恒生指数期货外，自1990年以来还衍生出恒生分类指数期货、恒生指数期权、认股权证、备兑认股证、地产设备兑认股证、指数期权和银行设备兑认股证等。另外，联合交易所正酝酿推出股票期权，期货交易所计划推出股票期货，首批将推出汇丰银行和香港电讯的股票期货合约；从货币市场衍生出利率期货、利率期权；从外汇市场衍生出货币期货、货币期权；从债券市场衍生出外汇基金债券期权；从黄金市场衍生出黄金期权。另外，还有货币、利率掉期交易、由数类基础金融工具共同衍生出来的产品以及投资衍生工具的基金等等。

二、衍生金融工具规模不断扩大，成交量急升

金融衍生产品的买卖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两种。前者在联合交易所统一设计和标准下买卖，包括恒生指数期货、恒生指数期权等；后者则由买卖双方通过经纪按照度身订造的条款，自订合约。1993年恒生指数期货交易成交量达2,415,739手，比1992年增长了122%，1994年首7个月的成交量已达2,378,251手，接近1993年全年的水平，更创下自1987年股灾以来的最高记录；恒生指数期权成交量在1993年3月推出时就超过10,000手，1994年7月已达46,876手。场外交易方面，据统计，1994年1至6月，联交所新上市证券中，衍生金融产品，例如备兑认股证、设有一连串息率上下限的走廊票

据等发行宗数已达 32 宗,集资额 81.65 亿港元,已超过 1993 年全年发行 27 宗,集资额 59.37 亿港元的水平,甚至超过 1994 年上半年香港公司股票发行 29 宗,集资额 67.22 亿元的水平。

三、市场参与者逐渐增多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发行人、经纪人及投资者。香港的场外衍生产品主要是由来自欧、美、日的大银行和证券机构设计和推出的。至 1994 年 9 月底止,已有十多家这类金融机构成立衍生产品部门,设计、发行和推广衍生工具。香港的一些大型证券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也积极地介入市场。截至 1994 年 8 月底,在香港联交所持牌买卖的 63 只备兑认股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本地的证券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这些机构还积极提供经纪服务。期货交易所可从事期权买卖的会员,已从 1993 年初的 33 家增加至 1994 年 9 月底的 50 家。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的范围也在扩大,除大型机构投资者外,越来越多的小型投资者也开始介入,而在香港推出的衍生工具以及由香港基础金融工具衍生出来的产品,在海外也很受欢迎。

近年来香港衍生金融工具快速发展,是受市场实际需求驱动的结果。首先,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满足了投资者的对冲、套戥和投机性的需求。目前主要西方工业国均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引起了外汇市场汇率的大幅波动。随着八十年代金融管制不断放松,货币和债券利率也呈现剧烈波动的特征,使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参与者增加了对汇率、利率、股价波动的风险管理需求。香港的金融业相当发达,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活动,有的投资于各种金融市场工具,有的以多种形式筹措资金。鉴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导致了利率、汇率的波动加剧,投资者便有利用衍生金融产品转嫁风险的实际需要。因此,香港大力发展衍生金融工具,提供以杠杆式买卖(俗称炒孖展或按金买卖)为主的风险管理新方式,可让投资者以较低廉的成本,灵活地对冲、分割及重新组合风险,把

投资者难以管理和不愿意承担的汇率、利率和股价波动等风险转嫁给愿意承担风险以获取高收益的人,降低股价、汇率和利率与预测方向相反的损失。此外,有了衍生金融工具规避风险,投资者便可放心地参与基础金融工具的投资活动,从而有助于股票、债券、外汇及信贷等基础金融产品的发展。

其次,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扩大了金融机构拓展业务的空间。随着金融非中介化和债务证券化趋势的日益显著,银行拓展传统业务的空间已较小,故纷纷增加商人银行业务的比重,开拓设计资本市场,衍生金融产品协助企业筹措资金,推出期权、期货和掉期等风险管理产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等表外交易(Off-Balance Sheet Transactions),冀在不增加资产的前提下增加手续费、服务费等收益,并藉新服务吸引新客户。同时,通过高杠杆比率的自营交易,银行还可赚取丰厚的利润。

最后,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发 展巩固了香港作为亚太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近年来,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均积极拓展衍生金融工具,亚太区的新加坡也跃跃欲试,希望在衍生产品业务上一显身手。如果香港不发展衍生金融工具,那么国际大银行必然会选择其他金融中心拓展衍生金融产品业务,同时把亚太区包括香港在内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吸引过去。目前在亚太区拥有由本地股票市场衍生上市的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就仅有香港、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地。新加坡场内交易的货币、利率期货和期权合约产品虽较香港为多,但场外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却比不上香港。至于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衍生金融工具的拓展可说尚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虽然香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与欧美发达的金融中心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却在亚太区占有一席之地。

衍生金融工具虽可以较低的成本对冲风险,增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但本身也存在着多种风险,包括:1. 市场风险。衍生工具的市场价值对基础工具市场的汇率、利率、股市指数等变量高度敏感,对基础工具市场波动的反应也很大;2. 信用风险或对手风险。即合约的任何一方违约的风险,衍生工具

需要连续对冲才能降低市场风险,但与此同时又增加了市场总体的信用风险;3. 流动性风险。许多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是度身订造的,不仅难以在市场上标价,而且也难以转售;4. 经营风险。即内部管理不了解衍生工具的复杂性,管理系统不健全,或不能适应突发性市场变化而产生的风险,以及结算风险、各国法律不统一和管理条例变化产生的风险等。

正因为衍生金融工具存在着多种风险,近年来已出现多家国际性大机构因此而发生巨额亏损的例子:德国的 METALLGESELLSCHAFT 石油金属公司的石油衍生交易亏损 14 亿美元,日本的 KASHIMA 石油公司的外汇衍生交易亏损 15 亿美元,香港市场也盛传多家公司从事衍生工具交易亏损甚巨。加上 1994 年美国连续六次加息造成股票、债券市场大幅下跌,未受宏观监管的对冲基金、保险基金等大量使用衍生工具交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量大,交易集中,并且是跨国交易,如果相互联系的交易对手任何一方出现违约,或结算出现问题均有可能引致连锁反应,它不仅会使一系列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而且可能从衍生市场波及现货市场,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香港乃至全球的金融体系。有鉴于此,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一再呼吁要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

各国和国际性的金融监管机构经过近两年的考察和研究,决定从要求市场参与者完善其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的内部风险管理着手,逐步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1994 年 7 月 27 日,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发表一份监管指引咨询文件,目的在于强化参与场外交易衍生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同时,还将考虑市场风险因素,修订银行资本充足比率的计算方法。1994 年 9 月,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就上述监管指引,向香港证券业和银行业咨询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险管理问题,并计划在年底拟定一份守则。预料这一守则将

包括以下监管措施:

1. 制定公布资料和报告系统的统一标准。由于衍生工具交易属表外科目,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如果银行和证券机构不公布交易资料的细节,投资者和债权人便无法评估银行和企业参与衍生工具交易的程度及其风险。

2. 会计制度标准化。现行会计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根据市场价值确定衍生工具的风险暴露程度。但实际上许多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并不存在二级市场,无法确定其市场价值。

3. 资本充足比率规定。在衍生工具交易市场,交易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性更强。但大量的衍生工具太新奇,评级机构实际上难以确定其真实风险。经过衍生工具对冲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传统贷款的流动性更强、信用风险更小,仅表现为衍生合约名义值的 1.5%至 2.5%,故人们对由此而确定的资本充足比率存疑,逐步向上调整现有的资本充足比率将是大势所趋。

4. 加强清算、结算和支付系统的建设。缩短交易日与最终支付日的时间差,并使之标准化。广泛采用金融工具交易的同日交割支付制度,以增强各种金融工具的市场流动性。

对于加强监管,衍生工具市场的参与者大多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担心加强监管会遏制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加强监管过程中如何做到宽严得宜便显得十分重要。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集中,衍生金融工具的拓展紧随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衍生工具的交易活动也主要集中在美资、欧资的大银行,故香港有追随国际监管标准的必要。此外,在未来数年内,亚洲国家利用外资发展基础建设的需求很大,因此,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冲汇率、利率风险的需求潜力也颇大。如果香港能通过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以减低金融市场大起大落的概率,将有利于吸引海外客户,从而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责任编辑:郑佩玉]

1. 基础设施是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一般说来, 基础设施应超前发展, 或至少与经济发展同步。

2. 由于粤港各自为政, 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发展不平衡、互不协调、不联网的现象相当普遍, 迫切需要从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种基础设施的需求出发, 衡量和改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 以满足区域现代化、国际化和香港平稳过渡与内地衔接的需要。

3. 香港基础设施现代化、国际化及超前经济发展是香港成为国际贸易、航运、制造业、旅游、金融、信息中心的基础, 应充分发挥香港自由港及其设施网络的作用; 不过, 目前香港的机场、港口、铁路、公路均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 应逐步建立广东现代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网络, 不应过分依赖香港, 现时是建设这个网络的最佳时机。粤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竞争的一面, 不过相互配合、联网、协调发展应成为今后的主流。面对 1997 年, 粤港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越复杂、越具体、细微。目前各自为政、自发研究、自行建设已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而且会造成恶性竞争, 后患无穷。

4. 铁路方面: 广九铁路已超负荷, 九成运力用于客运, 港段客运量 2 亿多人次, 其中从罗湖过境 4100 万人次; 内地铁路运往深圳北站的出境货物 4 百多万吨, 香港铁路段只能接纳 228 万吨, 而且不断下降, 余下货物要用汽车转运至香港, 增加装卸费用, 又费时。广深准高速铁路今年底可开通, 但香港方面未能接驳。广东许多市都有开直通车到香港的愿望, 受到线路、海关的限制。2010 年粤港铁路客运量至少达 8 千万人次。京九铁路和广梅汕铁路将在明、后年陆续通车, 后者并将延伸到福建, 估计近期货运增加 3000 万吨, 远期可达 6000 万吨, 其中出口货物约占一半左右, 广九铁路客货运压力有增无减。香港方面为改善粤港铁路运输状况, 于 1993 年 4 月推出了“铁路发展研究”,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耗资 3 百多亿港元的“西部走廊”, 包括近郊客运线、长途客运线及港口铁路线三个部分, 整个工程拟在 2001 年完成, 较广东建设的几条铁路滞后四、五年。而且, 新铁路九成运力仍将用于应付新

粤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管见

郑天祥

增的客运, 这还未包括香港西北部规划发展 90 万新市镇人口每天往返市区所形成 60 万人次的客运量。西部走廊的货运能力充其量也不会超过 1 千万吨。为此, 需研究加速“西部走廊”和“西部外走廊”的计划以及提高线路标准和运力的可能性。“西部外走廊”计划要在 2001 年后才开始考虑实施。

5. 公路及口岸方面: 目前粤港公路主要通过文锦渡、皇岗、沙头角三个口岸接驳, 1993 年通过 2.01 万车次, 文锦渡、沙头角口岸已饱和或基本饱和, 皇岗口岸设计日通过 5 万车次, 不过由于过关手续繁杂以及香港道路系统限制, 最多只能通过 1.9 万车次。预测 2000 年日均通过 6.7 万车次, 2010 年达 13 万车次, 三个口岸 24 小时开放充其量只能负担一半, 必须开设新的口岸和建设相应的疏运路网。深圳市提出了在蛇口建铁路、公路两用大桥至香港元朗, 以便使广深高速公路、平湖蛇口铁路能与“西部走廊”或“西部外走廊”相接, 不

过, 这是远期计划的事。迫在眉睫的是深汕、惠汕高速公路即将建成, 东部来车剧增, 要通过深圳市区进入文锦渡口岸, 计划兴建横岗至莲塘的快速干道及建莲塘新口岸, 这就需要香港方面研究开辟香园围口岸以及扩建至罗湖或新建至粉岭的快速干道的可能。珠海市提出修建伶仃洋大桥至香港烂角嘴, 香港方面尚无相应的规划, “西部外走廊”计划也未考虑伶仃洋大桥的车流量。伶仃洋大桥只通香港将难以发挥沟通粤东、粤西沿海地区的作用, 因为 1997 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但进出香港的车辆仍然不会像在省内那样方便, 何况香港已是一个交通“瓶颈”, 又何必再往“瓶颈”又钻又出。因此, 伶仃洋大桥应考虑从内伶仃岛分岔分别联通深圳蛇口和香港烂角嘴。

从公路及口岸状况分析, 广东应着力于软体建设, 简化过关手续, 实行各部门的联检, 并进一步与香港联检, 全天候通关。香港方面在站场设施, 路网方面要加快建设, 尤其是加快 3 号干线建设。还应放宽内地货车进入香港, 以平衡两地运输, 目前港车占 95% 以上。

6. 港口及珠江河运方面: 香港 1993 年吞吐量 1.1 亿吨, 货柜处理量 920 万个标准箱, 其中有 650

万个是内地提供的箱货, 主要是广东的。香港政府《香港港口发展战略》预测 2011 年吞吐量达到 4.48 亿吨, 货柜处理量达 3000 万个标准箱, 明显偏大, 没有考虑到广东港口群发展的状况, 尤其是珠江口港口群发展规划。2000 年广东省港口吞吐量达到 4.2 亿吨, 2010 年达到 7.2 亿吨, 其中广州、珠海、深圳、惠州四个枢纽港均有亿吨大港的计划, 总吞吐量将与香港相若。广州港深水航道条件较差, 但内河、铁路、公路等内外辐射, 中转条件最为优越; 珠海港西部水深条件较差, 不过珠江三角洲西部为经济发达地区, 缺乏深水良港, 加上粤西、西江联运及大西南腹地的需要, 珠海港亦具备亿吨大港的潜质; 深圳各港口水深条件好, 尤其是盐田港, 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及深汕、深惠、广深高速公路将大大改善深圳各港口与腹地的联系。目前来看, 以广州、珠海、深圳、惠州四大港口为核心组成的珠江三角洲港口群, 货源充裕, 每年新增的货柜量超过 1 百万标准箱, 就是在效率上、管理上以及国际航线的开辟上仍落后于香港。不过香港货柜运输的成本越来越高, 如码头装卸费每标准箱 1200—1800 港元, 是内地港口的 5—7 倍, 较新加坡高 1/3—1/2, 较高雄港高出一倍。加上 9 号、10 号货柜码头建设一再拖延。香港航运界已纷纷在珠海高栏、深圳盐田以及内河南海三山港、番禺南沙港投资建码头, 必将大大增强这些港口的国际性,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珠江流域航运开发 30 年规划已通过交通部审定, 预测 2000 年货运量将突破 2 亿吨, 潜力很大, 估计可达 6 亿吨。粤港之间陆路运输已出现瓶颈, 预测水运会受到更大的关注, 疏浚河道, 增添快船及码头设施, 水运量会有较大增长。港府预测内河货运量 2000 年达 4920 万吨, 2011 年达 8480 万吨, 可能偏小。

7. 机场方面: 除香港出现饱和的迹象外, 内地近年建设许多机场、添置大型飞机, 已开始出现卖方市场。而香港新机场、广州新机场以及深圳机场的最终客运规模都在 8 千万人次。珠海机场和澳门机场分别在今明两年陆续投入使用, 规划客运量分别为 1200 万及 800 万人次, 还有佛山机场和惠州机场的扩建, 以及新建肇庆、江门等机场, 珠江三角洲将有 9 个机场, 最终总客运能力达到 2.8 亿人次, 是未来总人口的 9 倍, 而目前香港的客运量只是人口的 3 倍多。机场建成后有没有这么多旅客实令人担忧。有些机场相距不到 30 公里, 达不到最低安全

距离的要求, 将给空中调度与管制带来许多困难。

8. 电力方面: 广东规划 2010 年装机容量达 7000—8000 万千瓦, 除在沿海修建十几座大型电站, 还与西南合建水电站, 实行“西电东送”, 容量已达 284 万千瓦, 已完成输变电工程, 将继续扩大容量, 大西南可供开发水电资源达 1 亿千瓦以上。香港电力容量到 2001 年达 1200 万千瓦。不过, 电力的进一步发展已受到环境容量的限制, 今后, 由香港向广东供电的状况将反过来由广东向香港输电。

9. 供水方面: 随着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和, 东江水将不敷供应, “西水东调”势在必行, 未雨绸缪, 应组织专门队伍, 研究和规划取水点及输水路线, 沿线控制各种污染源。

10. 深圳河及珠江口的联合治理。1993 年两次大雨和今年的一场大雨, 充分暴露了深圳河失于治理的问题, 1993 年不完全统计, 香港新界仅农田损失即达 8000 万港元, 深圳市损失 3 亿元。深圳河的合作治理谈论了十多年, 未能付诸行动, 大雨促成了粤港合作治理。珠江口的污染日益严重, 亦需合作研究与治理。

其它方面提到议事日程的还有通讯的联网、珠海市规划在 2010 年修建东部环岛隧道, 通过香港大屿山等。

11. 粤港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 建议首先成立以基础设施学术界企业界为主的粤港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 下设各个专项小组, 对两地的基础设施进行研究, 交换双方的规划研究资料, 提出协调与合作的意见, 供两地政府和合作投资提供决策依据, 第二, 成立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会, 除用以资助上述各项研究、咨询活动和会议之外, 也可集资投资、参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 成立半官方的大型基建协调管理委员会, 对两地口岸管理、空中管制、边境水陆交通等进行协调; 第四, 待时机成熟, 估计要在 1997 年后, 成立两地政府属下的粤港基础设施规划协调委员会。在珠江三角洲应首先成立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市长联席会议, 定期不定期召开规划协调会议。

按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十分庞大, 仅广东省就需要上万亿元, 除吸引香港的资金投入以外, 应积极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及各国政府的贷款。

基础设施大部分是技术密集型部门, 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粤港之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科技合作, 人才培训和交流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责任编辑: 陈丽君〕

利用香港促进 广东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雷 强 杨经革

进入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广东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力争在 20 年内使全省经济、社会综合实力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加速实现经济国际化。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广东必须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伐,开拓跨国经营,发展海外投资。

一、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再创广东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1、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迫切性

从九二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国各省、市、地区尤其是上海、天津、辽宁、山东等沿海省市纷纷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广东要继续保持国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不得不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利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加速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发展。

广东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迫切性,还在于国际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旧的国际市场已趋饱和,同时发展中国家又纷纷致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致使当今世界贸易中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形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将面临严重的考验。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的加剧,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世界贸易中的这种新局面,广东要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加速实现本地经济的国际化,除必须致力于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扩大对外贸易,还有必要开辟新的对外经济途径,以促进对外经贸的发展。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发展将无

疑是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

广东开展跨国经营的迫切性,还有来自内部的原因。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的“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到 2010 年,全省的出口总值将达 2400 亿美元,年递增达 14.6%。根据这个要求开展对外贸易需要有新的途径和措施。因此发展和开拓跨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将显得尤其的重要。而目前广东的境外企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广东经济的国际化,不但要求成功地引进大批国际著名、技术一流的跨国公司,也要求广东拥有自己的一批较有竞争实力的跨国企业。可以说,只有发展跨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才是广东经济走向国际化的结合点。

2、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利益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是指一个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总公司,控制着一大群海外分公司,这些分公司都是按统一战略行动的。跨国公司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研究、开发和转让,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主体。跨国公司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跨国公司的开拓和发展。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3.7 万家跨国公司,其分支机构达 17 万家之多。它们垄断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 95%,研究和开发的 85%,国际技术转让的 70%,国际贸易的 60%,国际生产的 40%,这种趋势仍在不断发展。可以说跨国公司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是与它带来的利益分不开的。

首先,从事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可以绕过日

益繁杂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打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束缚,维护和扩大出口市场。其次,发展跨国企业可以利用他国资源,扩大生产能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应。再次,从事跨国经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可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使本国经济和企业迅速成熟起来。另外,从事跨国经营还可以迅速了解国际经济信息,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营销能力,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分散企业风险,避免经济波动给企业带来冲击等。对于我国,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在现阶段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重返关贸总协定的需要,也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步骤。

为此,我们必须抓住时机积极发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再造广东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二、利用香港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

由于地缘和人缘的关系,广东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同香港紧密相关的。今后进一步利用香港发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就提出“再造香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7 页)。此后,邓小平同志还在多次讲话中谈到“再造香港”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再造香港”的实质就是“借鉴香港和利用香港”,借鉴香港搞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促使广东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利用香港的优势——国际地位,来促进我们的进一步开放。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广东经济的发展比较好地利用了香港的优势。广东通过香港开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现阶段,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实现广东经济国际化的新形势下,广东必须进一步利用香港的优势来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

1、香港的国际地位是广东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优势

香港现已成为世界上开展国际业务的重要地区。首先香港是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性贸易及服务总部的理想地点。据香港政府统计,1990 年,在香港

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企业已达 602 家。其次,香港又是地区性的金融及财务中心,1993 年世界上名列前一百家大银行中共有 81 家在香港营业,前二百家大银行中,也有半数以上在香港营业。再次,香港还是地区性通讯、大众传播及资料情报中心。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和高效率的电子通讯系统以及众多的报章、商业刊物和专门的资料库等,足以为从事国际业务的企业提供参考及使用。此外,香港还是地区性专业服务中心,目前世界知名的律师行、会计师行、顾问公司、工程公司、建筑公司以及其它专业公司,多在香港设有分部,为开展国际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

香港在开展国际业务,特别是从事跨国经营时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将成为广东进一步利用香港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优势。

2、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

广东利用香港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开拓跨国企业问题上,对香港的利用还很不充分。在大力开拓和发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今天,香港对于广东将具有比以前更为特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作为广东跨国企业中心的作用。香港以其优越的经济环境发展成为世界跨国企业的集结地(中心),广东将其跨国企业的中心设在香港,更是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广东可以利用众多的商贸关系网络开展业务,扩展企业的经营范围,减少经营风险;香港高质量的管理和通讯技术又有利于企业总部有效地统率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高效而快捷的信息情报网络、先进的运输设备和能力有利于企业开展国际业务;将企业总部设在香港,也有利于企业扩大国际影响,树立国际形象等。诸多的利益决定了香港作为广东跨国企业中心将是一种上乘的选择。

(2) 作为广东跨国企业试验基地的作用。广东因其人文、经济等与香港紧密相连,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竞争,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促使企业的快速成长。同时,在香港开展业务也有助于企业迅速掌握和利用跨国企业通行的一系列运行机制和操作方法,加速企业的成长。

(3) 作为广东跨国企业投资资金筹措的重要场所。

广东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努力在境外筹集发展资金。而香港作为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其融资能力将足以帮助广东的跨国企业筹措海外发展所需的资金,成为广东跨国企业弥补投资资金不足的可行的渠道。

(4) 作为广东跨国企业经营人才培养中心的作用。目前,广东开展跨国企业经营,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高素质的国际经营人才,相比之下,香港开展国际业务有较长的时间,已拥有一大批的国际经营人才,积累了从事国际业务的丰富经验。把香港作为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培养中心将是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香港对于广东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特殊作用”,为广东“捷足”发展国际业务创造了巨大的优势。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对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经营,进行海外投资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看我们是否具备“先登”的决心和勇气了。

三、广东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方式

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广东已经由一个以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实体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实体。但广东的工业是以轻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又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从所有制形式来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乡镇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私人企业占有重要地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根据广东经济特点,开展跨国经营和进行海外投资可采取如下方式:

从跨国企业的组织形式看,首先在发展跨国企业时,必须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组成企业集团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企业集团组织必须是较紧密的组织形式,以便于对外实行统一的战略,对内能够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和管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企业集团将是广东开展跨国经营的主要方式。其次,应充分发挥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作用,积极参与跨国经营。乡镇企业是广东经济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我们可以参照“四小龙”经验,以中小

型企业 and 乡镇企业为骨干,组成“企业联盟”的形式从事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这种联盟形式要求内部企业共同制订计划和确定产品项目,联合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以中小型企业或乡镇企业为主的“企业联盟”形式是广东开展跨国经营,进行海外投资的另一重要力量。再次,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也可以尝试合资、合作、合营的方式,这样既可以减少投资风险,又可以从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和技能,同时进一步扶持和壮大“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鼓励它们参与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从行业战略重点来看,应根据条件和需要,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广东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工业,具备现代工业技术水平,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严重缺乏,商业贸易较发达。因此在跨国经营的部门战略重点选择上,应该是资源开发、材料工业、高新技术行业、国际旅游酒店业、金融业等。

从经营策略上看,根据广东的情况,不必拘泥于跨国经营必须要以生产型企业为主,而应该是生产型与贸易并重,多元化经营。一般是以贸易型开路,生产型、高新科技行业为骨干,发展金融和国际旅游酒店业,实行多元化经营。当今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都离不开金融,而广东经济已具备在国外融资的能力,跨国经营必须从一开始便要从事国际金融活动,这是个重要趋向。特别是大项目,要做好融资准备,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等。

从跨国企业的区域战略上看,我们应把发展中国家放在重要位置,因为我们的产品、技术对这些国家比较适销对路,而且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广阔的投资市场。目前,东盟国家的市场条件较好,又与我省和香港有着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省发展海外投资。越、柬等国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投资热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一旦政局稳定,将是具有很大潜力的投资市场。非洲、南美洲市场也值得我们注意。北美和西欧地区,市场机制完善,竞争非常激烈,进入那里的市场,必须十分慎重。

四、制定政策措施,切实促进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发展

要切实提高企业从事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积极性,保障跨国企业在我省的快速发展和良好运行,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是当务之急。

1. 省委、省政府对我省发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要有紧迫感,应从各个方面大力加强跨国经营,使境外企业在一段时间内能有较大的发展。为此,(1) 必须按照当今国际上跨国公司的运作要求来制订我省发展境外企业、开拓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的近远期规划,使境外企业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加速发展。(2) 必须制定和完善对外投资、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使海外投资事业向法律化、规范化方向发展。(3) 必须适时调整政策,为发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提供政策环境。如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赋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并允许和鼓励各类企业在自主经营的前提下发展跨国经营;放松金融管制和外汇限制,扩大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融资权和投资权,以增强海外企业的海外融资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4) 必须制定优惠的财政金融政策,以解决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顾虑,如鼓励海外投资贷款、政府分担投资风险、税收抵免等。

2. 正确处理驻港澳企业与海外企业的关系。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在香港做的是“香港的国际市场”,在海外做的是“直接的国际市场”。广东驻港澳企业的重要目的是开拓“直接的国际市场”,因此它比“香港的国际市场”高一个层次,天地也广阔得多。做好在香港市场上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走向世界,开拓直接的国际市场。因此,驻港澳企业应该成为我省开拓国际市场的先锋、“通道”。今后应该把有关开展跨国经营,境外企业及其业绩当作考核我省驻港澳企业成绩的一项重要依据。

3. 制订政策,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到境外投资建立跨国企业。广东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发达,与海外关系密切,但它们很少从事跨国经营,有的很想参与却又得不到批准。为了调动这一批经济力量,有必要制订一些特殊政策,鼓励他们到海外开拓跨国企业。按照他们的条件,可以从中小型的境外企业开始办起,逐步发展壮大。

4. 积极利用香港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利用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集结中心地位,在香港建立广东跨国公司的总部,从而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利用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建立国际贸易渠道系统,开拓跨国经营。利用香港国际信息中心的地位,建

立国际信息网络和咨询渠道,开拓跨国经营,同时还可以与港资、外资合作,建立跨国企业,从而迅速地进入国际市场。

5. 重视培养跨国经营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可以邀请国内外专家,通过建立跨国经营培训中心等形式进行经营人员的轮训和培养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在港中资机构与国内专门机构、大专院校结合培养跨国经营人才,也可以与香港一起,联合培养。

6. 加强对境外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首先,应在省市一级对外经贸系统中组织境外企业研究队伍,在建立境外企业汇报制度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定期研究境外企业的各种问题。研究队伍也可以吸收一些系统外的同行专家学者参加。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群策群力,沟通信息,了解系统的真实情况的研究,对解决境外企业的各种具体问题将有裨益。其次,应迅速在省内建立跨国公司的专门研究机构,或在已有的国际经贸学会、国际经济研究会中设置跨国公司研究会,在有关大专院校中加强或成立跨国公司研究室、组,集中全省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来研究跨国公司问题。并积极与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广泛收集关于跨国公司的资料、情况,深入研究,提出各种意见,以供开拓跨国公司的决策作参考。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 《广东年鉴1993》,广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年鉴社出版。
3. 《中国人民银行年报1992》,中国人民银行编。
4. 《跨国企业经济学》,〔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5. 《国际企业管理》,叶春生,刘永霖,丁安年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 《跨国经营实务》,许扬,钟斗祥,马福元,刘文韶编,海天出版社,1991年3月版。
7. 《九十年代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研讨会(上海)论文集,朱荣林,叶刚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8. 《广东呼唤跨国公司——引进与开拓跨国公司是我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决策》,雷强,1994.6.6,广州日报。
9. 《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罗整风,王伯言,财经科学,1993.2。

〔责任编辑:李晟〕

“一国两制”与粤港澳经济关系前瞻

郭小东

一、“一国两制”理论中的有关论述

“一国两制”，按邓小平高度概括的说法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¹⁾根据这一定义性的概括，再结合邓小平其他有关论述，“一国两制”理论中与粤港澳经济关系发展有突出联系的内容又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权统一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相应地对将来特别行政区保留适当干预权力。邓小平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确实是不干预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但这种不干预是以特别行政区“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为条件的，如果特别行政区发生了“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和“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中央就“非干预不行。”同时，对特别行政区将来所遇到的“没有中央出头”特别行政区自身“难以解决”的事情，也将由“北京出头”解决，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²⁾

2、实行“一国两制”，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社会主义是主体。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另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³⁾而作为小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不但无损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有利

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⁴⁾

3、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台湾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不变。邓小平就香港问题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⁵⁾“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⁶⁾

4、实行一国两制，将是一项长期稳定的国策，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将来港澳台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中国长期并存，不作改变。邓小平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⁷⁾

从这些内容可见，将来“一国两制”的实施，将对内地和港澳的发展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也相应地将对广东与港澳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今后粤港澳经济关系的格局将由此决定。下面，就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一国两制”的实施对粤港澳经济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国两制”的实施给粤港澳经济关系发展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一国两制的实施，将为进一步加强粤港澳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远比现在有利的条件，从而可有力地推动粤港澳经济关系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1、一国两制的实施，将为进一步加强包括广东在内的大陆与港澳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一个崭新的总体条件。在现有条件下，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

联系虽然已相当密切，但这种联系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在企业或民间的层次展开。港澳与内地在主权上的不一致，仍不可避免地给内地与港澳两地之间的经济交往带来种种阻碍。现在的港澳当局，港府听命于英国，澳府听命于葡国，两地政府的政策取向，亦以维护英国或葡国的利益为先决条件。在这一先决条件下，港澳政策对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关系问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一种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澳门政府在进入过渡期以来所采取的总体政策；也可以不惜牺牲这种关系，如香港彭定康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但无论如何，它们的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立足点，绝不可能以中国的利益作为其立足点。在对待与内地的经济关系问题上，如果遇到与英国或葡国的利益有冲突时，港澳政府必然采取维护英国或葡国利益的做法，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内地与港澳地区关系的发展中显然存在着障碍。尽管这种障碍有时突出，有时较不明显。到1997、1999港澳回归后，随主权的统一，内地和港澳特别行政区都将处于同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原有的因主权分裂而造成的障碍将完全消除，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条件之下，这必然带来内地与港澳经济关系的根本改善，而且，由于港澳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将由中央出头解决，港澳两地特别行政区在施政中遇到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将可在中央的支持下通过内地的协助予以解决，港澳地区的根本利益将得到中央强有力的保护，这又必然推动港澳两地对中央向心力的不断加强，从而使港澳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在全新的条件下得到不断增强。在这种大趋势下，广东与港澳两地的经济联系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2、一国两制有利于内地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内地更好地利用港澳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桥梁。实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港澳回归后，无疑将继续施行。中国要加强对外开放，固然可采取许多方式，现在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都将继续是行之有效的做法。但与此同时，通过一国两制保持港澳地区现有社会制度，经济地位和经济运作机制不变，使之更好地发挥作为内地现代化的窗口桥梁作用，则仍将

是一个内地加强对外开放的有利途径。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就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言，港澳地位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不可替代性既在于港澳地区经长期经营与海外众多国家、地区建立起来的广泛经济联系，在于港澳地区所拥有的发达灵便的现代通讯条件；也在于港澳地区所拥有的自由港地位和独立关税地位，在于香港所具有的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还在于港澳地区所保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内地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地区将具有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港澳地区与内地相比，具有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更为便利的条件，更易于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对不少外国资本而言，港澳仍将会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基地，不少外资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性总部仍将设在港澳，以便既可就近展开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又可在港澳地区的条件下按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运作。港澳地区将成为沟通内地与海外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媒介。在内地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竞争乃至激烈斗争仍将存在的情况下，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为特殊的地位，它可以起到在斗争的严峻时刻突破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封锁、“贸易制裁”的作用。以上内容清楚地显示出，内地要加强对外开放，必须进一步发挥好港澳的窗口桥梁作用，在此情况下，处在全国开放前沿的广东，也必将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地区的经济联系。

3、一国两制有利于港澳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可使之具备与内地进行经济合作的更好条件。港澳回归后，由于弃除了原有的外国殖民政策的干预，又可继续保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地位不变，特别行政区还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更加上内地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又把维护港澳的稳定繁荣作为基本政策，这些都为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投资经营环境。从而有效地起到坚定现有投资者信心，增加对外资吸引力的作用。这肯定有利于港澳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同时，港澳回归后，它们背靠大陆，以大陆为依托的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它们所具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等条件外，离不开内地的依托、支持，离不开内地所提供的大量投

资贸易机会。港澳地区大量的经济活动，都是以内地为靠山、为条件而展开的。当然，在利用内地条件的同时，港澳两地也为内地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到港澳实现回归后，它们与内地的联系将大大加强，它们从大陆获得的支持将更为充分，这无疑是对港澳经济发展繁荣的有力保证。另外，1997、1999 以后，港澳两地之间的关系可望有突破性发展。在现有条件下，港澳分属英、葡管治，两地政府的关系长期处于微妙状态。尽管港澳两地的民间经济交往已达到非常繁密的程度，但两地政府则一直保持一定距离，这对两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了障碍。到港澳两地回归后，这一障碍归于消除，而两地在地理、人文、经济制度等方面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对两地之间经济关系发展将带来积极推动作用。从这些因素看，到港澳回归后，按一国两制构想的原意保持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可以肯定的。而只要港澳地区能够保持发展繁荣，原有的经济地位能得到更好保持，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关系就能更充分展开，与内地经济互相推动的作用就能更好地发挥。在这种经济关系的互相推进中，广东必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好处。

从以上的内容可见，在上述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变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港澳的回归与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相配合，可使内地与港澳地区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少具体做法、技术规范得到进一步衔接和沟通，必定可以推动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东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必定可以步上一个新台阶。

三、“一国两制”条件下粤港澳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限定因素

港澳回归后，广东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明显的发展，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是否粤港澳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如有些观点认为的那样，可以无限地升级，直至达到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呢？个人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国两制之下，内地和港澳地区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将长期存在，这些差异对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与港澳之间经济关

系的发展将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使之不可能向一体化的方面不断进展。

按照现在较为通行的国家、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理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大体上有五个循序渐进的类型（或称五个发展阶段）：（1）自由贸易区，即实现内部无关税；（2）关税同盟，即在内部无关税的同时对外统一关税；（3）共同市场，即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4）货币联盟，即建立跨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实行同一的货币政策；（5）经济一体化，即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

参照这一划分，再结合将来一国两制实施之下广东和港澳的实际情况，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广东和港澳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将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

1、广东与港澳之间关税制度上的差异将长期存在。港澳均是实行自由港政策的地区，绝大部分货物可免税自由进出，自由港政策对两地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一国两制后，港澳地区的自由港政策将继续施行。而广东的情况与之明显不同，广东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虽然享有一定的特殊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措施，但是，作为广大内地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既无权决定境内海关的关税变动，也不可能和没必要向港澳的自由港政策靠拢。反之，港澳地区也不可能放弃作为其经济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自由港政策向广东或内地的关税制度靠拢。因而，广东与港澳两地间关税上的差异将长期存在。这必然对广东和港澳之间贸易往来形成一定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同时，港澳地区都是作为独立关税区而存在的，它们既无向中央缴交关税的任务，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地区的关税政策。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对它们发展对外交往，争取加入各种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争取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这两个地区更好地发挥内地建设的窗口桥梁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广东这方面的情况也与之不同，广东不但不是一个独立关税区，而且，在利用港澳独立关税区这一条件时，还须主动把握好界线，防止出现诸如在港澳地区纺织品的配额运用上所引发的问题，以免给港澳的独立关税区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因此，广东和港澳地区在这方

面的差异也将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这些差异或限制的存在，就决定了粤港澳之间难以形成一个以内部无关税，允许货物自由流动为内容的自由贸易区，更不可能形成一个以对外统一的关税为内容的关税同盟区。虽然，广东通过三来一补的出口退税或开辟保税区等方式可收到扩大与港澳间货物自由往来的效果，但对全省而言，这毕竟是属于局部性、有条件的做法，这些做法与港澳产品可畅通无阻地进入广东市场，仍有着根本的不同。

2、粤港澳之间建立共同市场，即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这不但与上述关税政策的差异限制了物质资料的自由流通有关，也与一国两制下港澳地区所处特殊状况有关。港澳两地地域有限，经济容量与内地相比有天壤之别，这既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客观依据之一，即在社会主义的巨大主体旁边，不怕小范围资本主义的存在；但也给我们在实施一国两制时提出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即内地不怕因港澳资金、人员的进入而造成的冲击，相反，我们还欢迎港澳资金进入内地投放，也欢迎港澳人员进入内地在三资企业等单位工作。但对港澳地区而言，情况明显不同。面对内地如此巨大的一个主体，只要我们对港澳地区的投资政策稍作倾斜，口子开得稍宽一些，注入港澳的内地资金就可能对港澳当地的投资者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样，在人员流动上，如果我们内地人员进入港澳地区的各种渠道的控制稍为过宽，进入港澳地区的内地人员就会对港澳的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当地居民的就业。基于这一情况，为了保持港澳地区的稳定，保障港澳居民可以更好地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成果，即使在现在的过渡期，在资金、人员的输送投放上，内地对港澳都一直是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在资本投放上，内地资金是有限制地进入港澳地区的，进入港澳后开设的中资公司，在经营运作中的做法也有所注意，以求避免与当地资本形成过度竞争而影响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在劳动力的输送上，也是采取有限度的劳务输出，以免出现与当地工人“争饭碗”，压抑当地工资水平的正常上升等现象的发生。在过渡期时是如此，到 1997、1999 港澳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一做法肯定还要继续，而且要更加注重把握好内地对港澳地区资金、人员输送投入的量和度，以切实体

现出一国两制给港澳居民带来的好处，进一步增加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为港澳的发展繁荣，进而为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当然，这样一来，在内地和港澳之间资金、人员的流动上，就会形成港澳地区的资金、人员可以较自由地流入内地，而内地包括广东的资金、劳动力则只能有一定限度地进入港澳的局面。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会限制广东与港澳地区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方向的无限度发展，但从大局考虑，从国家整个、长远利益考虑，则是完全应该的。

3、粤港澳经济关系在向一体化更高形式的发展方面，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货币金融关系方面，实施一国两制后，广东与港澳两地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的差异仍将存在。港澳地区实行的是外汇自由进出的政策，而在内地，虽然我们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人民币也在一步步向自由兑换方向发展，但要取消外汇管制，实行外汇自由进出，仍将是一个牵涉面相当广，相当复杂的问题。而且，货币金融政策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广东一地而言，必须执行中央的调控，也不可能与港澳实行统一协调，不可能在粤港澳之间形成一个跨地区的中央银行，不可能在三地之间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人民币、港币、澳门元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仍将在各个相应的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广东在港澳地区设立的金融机构要按该地的法规进行运作，港澳地区进入广东的金融机构须按内地的法规营运。三地间的货币同盟将不可能出现。在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方面，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广东与港澳地区的情况也明显不同。广东执行的是中央制定的政策，经济上直接接受中央的调控；而港澳特别行政区在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可自行制订经济政策，中央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政策将基本不予干预，让其按自行确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在广东和港澳之间也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而且，粤港澳之间也没有必要实行完全同一的经济政策。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在粤港澳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同时，各自又都在发展新的合作伙伴。港澳资本在内地的投放，港澳企业在内地建立的合作关系，在地区分布上已越来越广，已逐步改变了内地开放初期高度集中在广东的状况。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广东与海外的直接联系（下转第 28 页）

从流动性监管看香港银行业 监管的新取向

(香港) 罗文华

一、香港银行业发展并不一帆风顺

在二次大战后至五十年代期间, 香港经济处于复原期。六十年代在出口加工工业带动下, 经济开始起飞。七十年代香港金融业, 尤其是银行业发展颇快, 至八十年代, 香港已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至 1993 年底止, 香港共有 172 间持牌银行, 其中 140 间是外资银行。在全球最大的一百家银行当中, 超过八十家已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香港银行业利润率相当高, 处于全球前列。1991 至 1993 年间, 香港银行盈利每年增幅连续三年维持在 30% 至 40% 之间。香港银行的资本素质在世界上亦享负盛名。

虽然如此, 过往几十年香港银行业的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1965 年香港曾出现过自 1866 年以来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导致一些银行清盘及控制权转移。在 1982 至 1986 年间, 多家香港银行亦濒临倒闭边缘。这反映出当遇上不稳定的政治形势或不利的宏观经济情况时, 个别银行的诈骗行为或管理不善便很容易暴露出来。1991 年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 [BBC (HK)] 事件更反映出, 即使在一个监管完善和运作畅顺的体制下, 银行业也颇容易受到外来的冲击和影响。

二、1986 年银行条例是银行业监管的分水岭

1986 年港府颁布新的银行业条例, 可被视为香港银行业监管的一个分水岭。该条例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 同时参考了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经验, 目的是推行一个全新的和更现代化的监管方法。这方法富有较大弹性和采用更多监管准则, 使有关监管制度更为合理和完善。该条例与过往的条例有较大不同, 比以往更为严谨, 同时堵塞了不少漏洞。过往的监管方法着重监察银行遵守不同的财务比率, 对全面评估银行的优点和弱点并不足够。

1986 年的条例只是一个开始。近年香港银行监管处在改善监管方法和有关法律架构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其目的是希望确保香港银行体系的监管和运作能追上国际水平。香港在 1989 年便采用巴塞尔协定的资本充足比率对银行进行监管。虽然略迟于马来西亚, 但仍为国际上较早采用此比率的其中一个地方。香港银监处在 1992 年发表了一系列详尽的银行内部管理指引, 由董事会的职责以至电脑系统的应变措施等, 均作出严格的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后, 正逐步对银行财务资料的披露、利率风险、市场风险和贷款分类等, 提出进一步的监管指引。这些改动希望能提高银行管理水平, 使金融体系更为健全。

经过数个月向银行业作广泛咨询, 金融管理局于 1994 年 1 月 24 日发出一份正式的指引, 名为《一个更全面监管流动性的取向》。这是监管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三、过往流动性监管内容及不足

在过往的银行监管条件下, 每间银行每月平均必须维持最少 25% 的流动比率。流动比率的计算是将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包括每月银行同业间的存款净额、一个月内到期的放款、纸币、硬币、黄金及其他在一个月内可以变现的资产 (包括十年内到期的可议付债务工具)。流动负债是指一个月内同业间存款的净负债和其他一个月内到期的负债。

过往香港银行监管处只依赖一个财务比率来决定一间银行是否符合最基本的流动性要求, 即流动比率。单单依赖这比率来作判断, 并不是一个准确和客观考察一间银行财务状况的方法。在新制度下, 金融管理局将采取一个全面的方法去监管银行的流动性, 包括采用一系列兼顾质量与数量的因素, 去衡量一间银行的流动性是否足够。

过往的监管制度有以下缺点:

1. 财务比率能较容易被操控及掩饰, 例如在货币市场以借长放短的方法来修饰有关比率。
2. 技术性比率不能充分反映流动资产组合内不同资产的借贷风险、市场风险和套现能力的差别。
3. 流动性不只是一个数字, 其实它能反映其他事情。传统的监管方法把流动性孤立地处理, 结果使监管机构只着重对财务流动比率的监督。事实上, 单靠一个比率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家银行对流动性管理的水平, 尤其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单看表面而不深入查看内容, 结果使有关监督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并流于机械化, 但隐藏着的、由于流动管理不善而引致的风险却不能揭露出来。

四、新取向的要点

在新制度下, 香港金融管理局将采用一个更为全面的方法去监管银行的流动性。除了考虑流动比率外, 还将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标准, 包括:

1. 流动资产分析, 即按每项流动资产流动性的高低乘以一个流动性转换因子, 以更准确地评估该项流动资产的情况;
2. 资产与负债到期日错配情况;
3. 在同业拆放市场的借款能力;

4. 存款基础的广泛性和稳定性;
5. 贷存比率;
6. 同一集团内部的拆借。

此外, 每间银行必须草拟一份能和金管局指引相符的流动性管理政策。这政策必须包括下列项目:

1. 一般处理流动性策略和在考虑上述六个因素后的有关目标;
2. 不同货币的流动性管理政策;
3. 在正常或不正常情况下的应变计划;
4. 显示危机将至的预警信号和有关处理行动;
5. 流动性资料的上报渠道。

金融管理局将按个别银行实际的运作情况评估其内部守则, 以此与监管标准相对比, 看看有否偏差。此外, 金管局还考虑以下问题:

1. 银行流动资产储备和其质量;
2. 存款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3. 或然负债和放款承担;
4. 可利用和可信赖的未提取备用信贷;
5. 在以全球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 其整体流动性的管理和监控水平;
6. 总行/母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援的能力和意愿;
7. 该银行在业内的地位和资金管理素质。

在对银行流动性进行评估时, 金管局会着眼于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与监控是否根据其制定的政策指引和程序行事。金管局不再倚重单一技术比率的评估方法, 取而代之是广泛利用同类银行的流动管理方法来作相互比较, 从而找出“出位者”, 即某些流动性管理政策和其他在同一市场位置上的同业有较大差异的银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行政总裁 (银行业) 简达恒曾在一个流动性管理研讨会上指出六大基本修订取向:

1. 主要的流动性管理责任将落在银行身上, 因此金管局要求每家银行均要拟订内部的监管政策文件。金管局的角色是确保银行的流动性政策至少与谨慎经营取向的最低要求相符。
2. 由于流动性管理较为复杂, 没有一个单一指标能对此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评估流动性必须考虑一系列不同的因素。

3. 必须了解流动比率和到期错配情况两者在比较功用上的关系。流动比率的作用是当遇上融资危机时,此监控制度能给银行提供一个“喘息空间”。检查资产与负债到期日错配的作用是监控银行在正常情况下,银行管理其每天流动性的能力。
4. 流动性的基本着眼点是短线的,以七日至一个月为期限。到期日错配分析则从一个较为长线的角度来考虑。
5. 流动比率必须是真实而不是虚假掩饰的。它必须包括高素质和能够在到期日出售或质押时能迅速套现的流动资产。金管局会本着这基本原则小心地审视某些内幕交易和背对背交易。
6. 流动性是否充足必须从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充分考虑。

五、新取向将有助银行提高管理水平

新的监管制度将对银行提高管理水平增添一定

的压力。短期内金管局将有系统地考察银行怎样进行资产和负债的独立管理和资产负债的协调管理。此外,从银行政策上反映出来的管理质素,在同业市场的信誉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将会被金管局严密地监察。新的监管取向将对银行,特别是本地银行构成一定压力,从而使这些银行在提高管理能力方面加倍努力。流动性管理不单只依赖资金部的运作,而是需要银行整体的配合,包括信贷、零售业务和代理行关系等等。流动性管理是整个资产负债管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香港现正经历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时期。1997 年香港主权将重新交回给中国。在这过渡期内维持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从这角度来看,监管银行流动性的新取向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将有功香港金融市场在一个更为健全的环境下运作,从而有助增强香港和国际性金融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继续平稳发展的信心。

〔责任编辑:李晟〕

(上接第 25 页)也得到不断发展,广东所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所引进的资金,在地区分布上也越来越广。广东和港澳的这种变化,总的说来都是好现象,好势头。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则粤港澳实行同一经济政策将显得更无必要。当然,这与粤港澳三地共同努力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关系毫无矛盾,这也是很明显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实施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广东与港澳两地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会受到一定限制而不可能向一体化方向无限制地升级、伸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广东与港澳两地制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为了大局,为了顺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造成的。或者说,为了和平实现港澳回归,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而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允许差异的存在。而且,这种差异的存在,也有着明显的有利于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利用港澳的特殊条

件,更好地发挥港澳地区的窗口桥梁作用的一面。同时,在实施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内地与港澳的关系必将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巨大的发展,而广东在发展港澳关系上仍将继续处于一种比内地其他省分更为有利的地位,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广东在积极发展与港澳两地的经济联系时,也应考虑到与两地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实际情况,进而才能针对这一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加强。

〔注释〕:

- (1)、(2)、(3)、(4)、(5)、(6)、(7)、(8)、分别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58 页;221 页;219 页;59 页;101—102 页;217 页;103 页。

〔责任编辑:陈丽君〕

中国因素与香港股市

——对恒生指数破万点的历史透视

朱德新 尚慧然

1993 年 12 月 10 日,香港恒生指数跃至五位,突破万点大关,以 10268 点收市,在当时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高指数的股市。学术界对此已有专论分析,笔者拟从中国因素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作一补充,以此说明大陆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恒生指数破万点的轨迹

1992 年香港股市在承接 1991 年底恒生指数(以下简称恒指)4297 点的基础上劲升,到 11 月 12 日达到 6447 点。但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后,股市随即大幅度下跌,仅 11 月 13 日到 12 月 3 日的三个星期内,恒指就下滑 1486 点,累计跌幅达 23%。此后,恒指在 5000 点左右徘徊,直到年底才略有回升。12 月 31 日,股市以 28% 的升幅旺市结束 1992 年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收市报 5512 点。

如以恒生指数的升降为标准,1993 年香港股市大致经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 月至 3 月,恒指大约在 5400 点到 6200 点之间徘徊。

自元月份伊始,股市一反农历春节旺市的惯例,呈现出大幅度的下滑。2 月份恒指有所回升,但起伏不定。3 月 12 日下午 3 时,彭定康宣布将政改方案刊登宪报,港股应声下跌 201.44 点,最后以 6170 点收市,此系 1993 年的第二大跌市。3 月 15 日,恒指急泻 315.79 点,成为 1993 年港股跌市之最,收市报 5854.61 点。

第二阶段,4 月至 9 月,恒指在 6000 点至 7600 点之间缓慢上升。

启动此阶段恒指上升的是政治因素。4 月 13 日,中英双方同时发布消息,宣布两国政府代表将

于 4 月 22 日举行会谈,商讨香港 1994、1995 年的选举安排。4 月 14 日,港股因此而上扬 371 点,恒指收市报 6789.74 点。5 月份,大陆国营企业将赴港上市的消息刺激港股上升,到 5 月 28 日,恒指创出接近 7400 点的好成绩。6 月,由于中英政制谈判特别是中英联络小组未能达成协议,加上大陆实行宏观调控,暂停入市支持人民币调剂价汇率,港人担心国内人民币贬值影响香港公司盈利等因素,港股大市又开始下调。7 至 8 月,港股大起大落,波幅近千点。9 月上旬,受汇丰等上市公司宣布中期赢利丰厚的刺激,恒指从 9 月 7 日起接连劲升两天,第三日曾一度达到 7663.63 点,但转瞬又掉到 7586.76 点的水平,比上一日反而下降近 20 点。只是到了 9 月底,在外资大举进军港股的情况下,恒指才摆脱了这种波浪式的徘徊上升局面。9 月 30 日,恒指升 125 点,以 7676.22 点的纪录结束了本阶段的股市。

第三阶段,10 月至 12 月,恒指从 7600 点左右狂升至 11888 点。

从 10 月 1 日开始,恒指连升 5 天。10 月 6 日、10 月 18 日连闯 8000 点与 9000 点两道关口。11 月 27 日,中英第 17 轮政制会谈没有协议,又未定出下一轮谈判的日期,英国单方面中止会谈。而 11 月 28 日是星期天,有人预计 11 月 29 日将是“黑色星期一。”果然这一天恒指下挫 261.65 点,成为 1993 年港股的第三大跌市。可外资不理睬中英政制谈判危机,仍大力吸纳蓝筹股,因而导致 12 月份的恒指升势加剧。12 月 10 日,恒指越过万点界限。此后,投资者情绪更加高涨,成交活跃。12 月 24 日,恒指穿越 11000 点关口。这段时间港股升势猛烈仍有成交的支持。12 月 31 日,恒指以 11888.39 的辉煌成绩给 1993 年的香港港股市打上一个最为圆满的句号。

1993 年港股的升幅达 115.67%，全年总成交额超过一万一千亿港元（港元，以下同），较 1992 年增加近一倍。港股总市值由 1992 年的一万四千亿元增至三万亿元，升幅为近 20 年之最，其绝对增长数居全球十大股市之首。

二、中国因素对港股飙升的作用

1. 大陆深化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巨大界外效益。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次召开重大会议，规划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落实深化改革的措施，进行国民经济攀登新台阶的部署，致力于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举世公认。199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12.8%，1993 年增至 14.1%，增长速度居全球之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和进口的需求增长快。

外资看好中国经济，纷纷前来投资。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1993 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达 270 亿美元，比 1992 年增加 3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投资热点，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占流入发展中国家资金的一成半。外资投资范围涉及面广，包括农业、轻工、食品等 26 个行业。外商投资结构方面，从加工出口朝产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从投资型向投资、金融相结合型方面转变。许多国际大财团与大陆大型企业合作经营、实行股份制，然后到西方国家发行股票，即将大陆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从国内迈向国际。欧、美、日等对中国的巨大潜力深感兴趣，美国最大的 500 家跨国企业，已有 52 家以上投资中国。美国工商业界普遍认为，中国大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产业加工区和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中港经贸活动更加密切与扩大。转口贸易占香港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而其中的八成与中国有关。大陆是香港入口货的最大来源，也是香港转口货的最大供应者和最大买家。1993 年内 地又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港制品的头号出口市场。前些年输往内地的港货，约四分之三是供当地工厂加工用的半制成品、原料和机器设备等，现此类货物已减至占总数的五成，其余五成则是日用消费品，它们的增加使港商大为受益。

香港旅游业进一步兴旺。其中内地赴港的游客在 1993 年增逾六成，增幅为全球各地游客之首，加上世界各地商务旅客经港转往内地数量的激增，亦带动了酒店业生意的发达。

内地不但是香港迅速扩展中的市场，同时又是香港厂商设厂的理想基地。大约 25000 家港商，70 亿美元的资金北移内地，它们雇用员工 300 万人，相当于香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5 倍。其经营活动覆盖面广，较有特色的是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后者已在华南地区建起强大的基地。由于大陆劳动力、厂租、土地资源等的物价低廉，此不仅使港商降低成本，还能赚取可观利润，又大大提高了港货在海外的竞争力。就香港股市来看，有 176 间上市公司在内地有投资，范围遍布全国，利润丰厚。

内地对香港整体投资累计总额增至二百亿美元，成为香港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内地银行在港已有 500 多亿美元的资产，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已超过四成。

正是鉴于上述多方面受惠于大陆，香港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中持续增长。

2. 红筹股与中国概念股热不断刺激港股活跃。

红筹股是九十年代香港股市的新生事物，它有三类。一类是在港经营多年的中资机构，将其在香港和内地业务分拆在港上市发行股票。如中国海外、海虹、中国置业等。第二类是中资机构和内地企业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又称收购空壳公司（指无负债、业务简单的上市公司）而取得香港上市公司地位后所发行的股票。其代表者是有“中资行股”称誉的中信泰富，它在 1992 年 8 月被恒生银行列入其四类 33 种恒生指数成份股中，其在香港市值大公司的位置已由 1992 年的第 20 位升至 1993 年的第 15 位。第三类则是自 1993 年 7 月中旬起陆续直接赴港上市的内地大型国营企业所发行的股票，简称 H 股（或国企股）。到 1993 年底，这种企业有青岛啤酒、广船国际等 6 家。联交所成功地引入 H 股来港上市，吸引世界各地资金蜂涌而至，因为它们资产丰厚，素质较一般壳股强，故深受投资者的欢迎，被视为参与中国经济、分享巨额利润的一个理想门径。在各路基金的追捧下，H 股和另外两类红筹股升势如虹，在异彩纷呈的香港股市构成又一奇观。这样一来，以重工业为主要成份的 H 股加盟香港股市，

不仅造就了香港财经界的极大繁荣，而且使港股股份分布更均匀、品种多样化、规模扩大化，从而大大加强了港股的活力和国际投资者的兴趣。由于 H 股的诞生，港股的综合企业股在 1993 年底增至 8288 亿元，将其在市场总值的比重升至 27.8%，这就逐步扭转大市过于偏重地产股的失衡局面。①

1993 年 9 月，以新世界发展宣布将其在中国的业务分拆在爱尔兰上市为开端，到年底有六间上市公司采取了相应的分拆活动。其原因是除大市旺盛外，还由于大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它们在内地投资的项目已呈盈利前景，而投资者又对中国概念甚感兴趣，以致不少上市公司的分拆业务与中国有关。

此外，与中国经贸活动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即中国概念股表现不俗，例如新世界、长实等实力蓝筹股就格外受到外资的青睐，一直成为其全力吸纳的对象。

总之，红筹股与中国概念股已占香港股市的三分之一，从而提高了港股的国际地位，增强了香港股市的稳定性和吸引力。

3. 外资涌入香港股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好中国经济。

西方经济衰退，利率低企，资金市场游资充裕。在世界投资市场执牛耳的美国基金为弥补 1993 年上半年的亏损，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将目光转向市盈率长期偏低的香港股市。1993 年 9 月，在拥有管理 420 亿美元投资资产的美著名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的推介和带领下，西方 30 多个基金经理（他们共管理超过四千亿美元的基金）组团前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访问。对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中国与海外、中国与香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和作用等作了全面了解和评估。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庞大的经济潜力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逐渐展露出来，因而具有美好的前景。中国及周边地区将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成为未来 10 年的最大盈利者。香港是自由港，沟通大陆与台湾，香港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得益者，国际资本适宜在此作长线投资。所以，美资大户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谭宾屯投资公司、美国养老基金会等都不约而同地增持港股的投资比重。其中摩根士丹利向管理该公司的多个投资组合的人员作出指引，调高港股的比重，即将世界性股票投资组合（Global Equity

Portfolio）由 0.2% 提高至 3%，升幅达 15 倍；将综合资产投资组合（Mixed Assets Portfolio）从 0.1% 提高至 1%；将新兴市场投资组合（Emerging Market Portfolio）从 11% 提升至 16%。②美资的一马当先，顿时刮起一股“摩根旋风”，把受日元升值困扰的日资和处于经济不景气的欧洲资本吸卷进香港股市。各路基金分段注入港股，造成每次调整市均有强大的支持，导致大市有欲罢不能的感觉。当摩根士丹利在 1993 年 11 月宣布减持其投资组合在港股中的比重时，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则将它在香港中的投资比重由 3% 增至 8%，正好填补摩根士丹利减磅后遗下的空缺，港股势头不减照常劲升。

4. 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将“政争”对股市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限度。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以最大诚意，并在作出多次让步的情况下耐心地与英方进行了 17 轮政制谈判，其行动本身就使港人清楚地看到中国方面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过渡期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依照基本法而组成的特区筹备委员会，就是在英国拒绝合作的形势下，为保证与“九七”顺利衔接所做的重要举措。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都将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以及基本法原则，有信心有能力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的前途无限美好。这些都给港人以信心和动力，亦吸引外资蜂涌入市。当时因而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边是恒生指数破万点，联交所开香槟庆祝；另一边是大量堆积的刊有部分政改方案的宪报无人问津。所以，香港舆论认为，若非内外投资者对内地政治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并认定中方确有决心和能力使香港续保繁荣安定之局，则在英方片面中止香港政制谈判以及彭定康将其政改方案“斩件”提交立法局讨论的恶劣情况下，股市很难不发生震荡和急跌。③

三、余论

1. 中国因素对香港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增无减。1994 年的中国正加紧落实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陆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劲的势头。对此，港府财政司麦高乐认为，中国（下转第 37 页）

历史是一面镜子

——谈深入研究澳门历史问题

黄启臣

夏书章老师在今年第 1 期《当代港澳》发表了题为《对澳门的历史、当代及前景的研究都应该提上日程》的论文。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实的澳门是由历史的澳门发展而来；而澳门的前景，又是从现实的澳门出发、前进所致。不割断历史，看发展进程，用通俗的话来说，便是昨天（还可以及于前天和远古）、今天和明天（还可以及于后天和更远的将来）的关系。因此，刊物虽标明‘当代’，但我们的理解是重点所在，而非狭隘地局限于此。‘无古不成今’，‘厚今薄古’不是无古，更何况‘今’在不断地向未来迈进，不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为迎接更好的未来准备，岂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甚至要承担历史罪过？”这说明，研究澳门历史不仅对于稳定、繁荣今天澳门的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将来澳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借鉴的作用。唯其如此，笔者拟就 10 多年来研究澳门历史所了解的情况作一介绍，并提出自己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想法，与有志于研究澳门历史的同仁共勉。

（一）

澳门虽然是一弹丸之地，但自从明中叶开始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家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之后，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四百多年来，无数中外学者对澳门历史进行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

不少专书和论文。在国内方面，早在乾隆十六年（1571 年），有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澳门记略》一书问世。接着又有张汝霖的《澳门形势篇》、《澳蕃篇》，张甄陶的《澳门图说》、《澳门形势论》、《制驭澳夷论》，薛韞的《澳门记》和汪兆鏞的《澳门杂诗》等专著印行，论及澳门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诸问题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以后至今八十多年来，研究澳门历史更加深入开展，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例如陈沂春的《澳门》、王仲达的《澳门地图》、黄培坤的《澳门界务争持考》、梁嘉彬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周景廉的《中葡外交史》、刘万章的《澳门考略》、陈正祥的《澳门》，戴裔焯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元邦建的《澳门史略》、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 年）》、邓开颂的《澳门历史（近代）》等著作出版，对澳门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人口变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等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发表了不少关于澳门历史的专题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自 1909 年至今，共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 1909 年至 1929 年发表的有《澳门之历史》（载《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4 期）等 9 篇，主要内容是介绍澳门的历史及划界问题；1930 年至 1949 年发表的有张维华的《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载《史学年报》第 1 卷第 5 期）、陈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镜澳考略》（载《历史学报》1936

年第 1 期）、朱杰勤的《葡萄牙人最初来华时地考》（载《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2 期）等 18 篇，主要考证葡萄牙人租占澳门的年程，申明澳门主权一直属于中国；1950 年至 1980 年发表的有戴裔焯的《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萄牙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1957 年油印本）等 5 篇，主要是揭露葡萄牙人企图把澳门变为殖民地的历史事实；1980 年以来，有黄文宽的《关于澳门史的考订》（载《岭南文史》1981 年第 1—2 期）。黄启臣、邓开颂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等数十篇论文，着重阐明自 16 世纪以来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起、发展、繁荣以至衰微的进程，分析其原因及其对中国、世界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有不少论文阐述澳门工商业发展的状态。这可以说是国内研究澳门历史的一个突破。

在国外方面，研究澳门历史者也不乏其人，出版、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也不少。主要著作有 Andrew Ljung 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1836)、A Margues Pereira: *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1870)、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o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 (1836)、Bento da Franca: *Subsidios Para Historia de Maeau* (1888)、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1902)、Tien-tse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1934)、C. R. Boxer: *The Grate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4* (1936)、J. M.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1949)、*Macau, A short Hand-Book*,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Department, Macau Government (1970)、Austin Coates: *A Macau Narrative* (1978) 等 100 多本专著。这些外国专著的主要内容是阐述 16 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利用澳门这个港口进行东西方贸易攫取暴利的进程及影响。与此同时，外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例如日本著名史学家藤田丰八的《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载《中国南海古

代交通史论丛》）、矢野仁一的《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兴衰》（载《史林》第 3 卷第 9 期）、J. E. Wills 的 *Macao's Impact on Chinses Foreign Policy, 1608—1808*、Roderich Ferdinand Georg Ptak 的 *The Transportation of Sandalwood for Timort Macao and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985) 等，主要内容是论述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贸易的情况，和明清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理政策和措施。

上述情况说明，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澳门历史的学者为数不少，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那么，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再拓宽澳门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更深入地研究澳门的历史诸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二）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历史和发挥澳门历史的功能，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广泛搜集中外文文献资料，编辑出版澳门历史资料专辑。

这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基础工程，舍此则其研究工作难以进行。梁启超说过：“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历史研究法》）。据我所知，明中叶以来，时人撰写关于澳门的中外文文献资料散见在各种书刊及档案以及碑刻是不不少的。例如明嘉靖年间编纂的郭棐《广东通志》（卷 69），就有专论《澳门》的宝贵资料。其他如收集在《明经世文编》一书的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卷 342）、庞尚鹏：《题为陈末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卷 357）；清康熙年间刊行的《抚粤政略》一书也收有李士桢：《澳门关闸请设专官管辖疏》（卷 1）、《请豁澳门旱路征收缺少银两疏》（卷 2）、《请除市舶澳门旱路税银疏》（卷 2）；收入《中西闻见录选编》的《澳门近事》、《康熙香山县志》的《澳门》、《道光香山县志》的《澳门》、《池北偶谈》的《香山澳》以及《广东新语》的《澳门》等等，都是研究澳门历史的珍贵资料。特别是流落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国

立多尔·杜·东坡档案馆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收藏的乾隆六年 (1741 年) 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的 1500 多件的清朝官方关于澳门的公文档案, 更是研究清朝澳门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另外存放在何东藏书楼二楼的四大木箱的中文档案, 虽然绝大部分是关于文学的, 但涉及澳门历史、地理的也有 50 卷, 可供参考。建议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 供研究者使用。

外文资料的收集对研究澳门历史也十分重要, 特别是要尽量利用目前在澳门的大批葡文档案资料。例如, 存放在原贾梅士博物馆一楼两个金属书柜内的参议会 1630 年至 1900 年的 316 卷档案; 存在仁慈堂后巷 8 号一个地下入口处的七个木柜内的 500 卷仁慈堂自 17 世纪以来商业和宗教活动的档案; 藏于澳门大教堂内的主教堂区档案; 藏于风顺堂街的神劳伦斯教堂的风顺堂教区档案; 藏于花王堂街的神安东尼教堂的花王堂教区档案; 藏于圣拉查罗街的圣拉查斯 (*S. Lazars*) 教区档案; 藏于筷子基街的法帝马 (*Fatima*) 教区档案; 藏于函仔的卡娜 (*S. N. Senhora*) 教区档案等, 对于研究澳门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 都是极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建议组织力量赶快抢救这将霉烂的档案, 供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参考。

第二, 开展澳门史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

澳门史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 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前研究澳门史, 往往侧重于政治史, 或是论述葡萄牙人如何入据澳门, 或是考订葡萄牙人何时何地入据澳门。而作为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研究, 澳门史研究应当包括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文化史、宗教史, 等等。这些互相联系、不可或缺的专门史和整体史还研究得很不够。主要原因是研究澳门史的力量比较薄弱。从大陆情况来看, 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澳门历史的机构, 只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少数学者兼搞澳门史的研究。而澳门、香港、台湾等地区和日本、欧美各国专门研究澳门史的学者也很寥寥。建议国内学者和港、澳、

台以至外国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加强合作和交流, 互相补充, 共同努力,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对澳门作综合性的研究。先编写出澳门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专史,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编写出多卷本的澳门通史, 以反映澳门历史的全貌。

第三, 着力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和特点。

要提高澳门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不能泛泛而论, 必须研究和把握澳门历史的重点和特点, 舍此不可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澳门历史的重点是什么? 我认为是澳门经济史, 特别是澳门的对外贸易史。澳门自 16 世纪中叶开埠以后, 直到鸦片战争的约 300 年期间, 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港口, 和东西方国家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当时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此为基地, 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果阿 (*Goa*) 直到里斯本, 澳门与日本长崎, 澳门与马尼拉直至墨西哥、秘鲁的国际贸易。这是以澳门为中转港的全球大循环的国际“大三角贸易”。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多种商品如丝货、黄铜、陶瓷等经澳门转运到世界各国; 世界各国的商品如毛织品、胡椒、象牙、苏木等又经澳门转运到中国及日本等东方国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各个国家还不能拿出象样的商品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的情况下, 世界各个国家均运来大量的银元, 到澳门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澳门在当时扮演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澳门本身的经济 (包括手工业、商业、渔农业) 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 由于香港崛起, 澳门在东西方国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仍然不失为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港。因此, 澳门的经济仍然继续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降, 澳门经济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其增长速度高居世界各国前列,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文莱、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成为第六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也被人们誉为亚洲的一条小龙。可是, 过去对澳门历史的研究, 较多地侧重于政治史, 澳门经济

史的系统研究不够, 澳门经济史的专著尚付阙如。有鉴于此, 建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 编写一部系统的全方位论述澳门经济发展面貌的专门史。这不仅可以反映澳门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而且对于今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澳门的经济, 也将提供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

如果说澳门经济史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的话, 那么, 与此密切相关的澳门文化史, 特别是以澳门为通道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史的研究, 则应是研究澳门历史的特点。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 则似是以澳门开埠始。继葡萄牙人之后,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澳门贸易。贸易的航道同时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随着澳门为中转港的中西贸易的日益发展, 大批天主教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而来澳门并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传播天主教的目的, 是“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 (《中国丛报》1836 年)。但是这些“东来者, 大都聪明特达之士, ……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 (《明史》卷 326, 《外国传·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 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 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 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 (周扬: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光明日报》1979 年 5 月 8 日)。因此, 一个不以耶稣会士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果和社会功能得以实现, 这就是: 耶稣会士努力了解、熟悉中国传统文化, 并向欧洲他们自己的祖国介绍与传播, 激荡着欧洲各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 促进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发展; 而中国的有识之士, 则通过耶稣会士学习和吸取欧洲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吸收,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举凡在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德国哲学家莱勃尼兹 (*Gofuried Wilhelm Leibniz*)、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康德 (*Immanuel Kant*) 和黑格尔 (*Hegel*) 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 在中国重农经济思想影响下, 法国的魁奈

(*Francois Quesnay*)、杜尔哥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和英国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合铸成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古典文学、工艺美术、绘画及建筑以及风俗等, 无一不影响着欧洲国家, 使之文化繁荣一时。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的天文、历法、水利、数学、地理、物理、几何、医学、音乐等近代科学文化也传入澳门并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一以澳门为通道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在深入研究澳门历史时, 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组织力量编写一部系统的以澳门为通道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这对于弘扬中国文化、吸收西方国家有益于我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知识, 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不无意义。

第四, 注意研究澳门与有关地区的关系史。

澳门历史是一部港市史, 属区域史的范畴, 自然要以澳门特定区域为主体。但要整体研究澳门历史和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和特点, 总是不可能与其他周边地区完全隔绝而孤立进行的。特别是澳门成为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之后, 必然与全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发生交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联系。例如, 澳门一直与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与香港保持直接的联系; 同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有密切联系, 同美洲和亚洲各国的密切联系。因此, 研究澳门历史, 就应开展穗港澳关系史、省港澳关系史、澳葡关系史、澳美关系史以至华侨史等的研究。这样, 澳门史的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为此, 我们建议国内外的学者加强联系, 分工合作, 互通有无, 共同设计研究课题和承担研究任务。同时开拓与国外研究澳门历史的专家合作的途径, 互通信息, 互换资料, 把澳门史的研究深入一步, 求得新的突破。

(责任编辑: 孟庆顺)

静静地革命

——未来香港的路向

(香港) 甘长求

(一) 第二次革命

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第三代——约翰·洛克菲勒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叫做《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1973，Hazre & Row 出版。1974 年，台湾新亚出版社中文翻译，——以下所引俱为中文译本的页数）。书中指出，美国虽然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但资本主义工业化也带来不少问题，比如“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市场为估量价值的主要标准，……置利益资财于人性之上的倾向等等”，具体表现为人口问题、庞大而集中的各种机构、浪费、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问题。洛克菲勒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继续走现在的路子，问题会日趋严重。最后的结果可以是制度的全面崩溃，或者施行严刑峻法以阻止其崩溃”（第 32 页）。因此，他明确地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美国革命”。

(二) 香港不存在第二次革命

约翰·洛克菲勒所指的美国“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即美国独立战争而言，两次革命相距二百年。就是说积累了二百年的毛病，非加清除不可了。

香港被英国占领一百五十多年了，但从未发生过革命。当中只是把封建宗法制度改为殖民制度，把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变动都是在英国人控制下有意识地加以改变的，有些宗法式的制度，目前还在保护之列。既然从未发生过“第一次革命”，当然就不存在第二次革命的要求与行动了。

香港从来没有过革命，那么今后能不能提“革

命”呢？特别是《中英联合声明》已保证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甚或可以延长）不变，那么是不是更不能提“革命”呢？

(三) 静静地革命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革命与暴力是双胞胎甚至是连体婴，只有暴力的行为才是革命的真谛。也有一些人误以为，革命就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把一切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些观念都是缺乏时代感的旧头脑的产物。

现代“革命”的含义已比以前广泛深刻多了，过去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的暴力革命，固然是革命，但也是破坏性更大的革命。今天许多带根本性的变化却是在静默地进行的，因此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叫做“静静地革命”。约翰·洛克菲勒要在美国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属于这种“静静地革命”。以法制的手段，逐步地改变一些旧事物、旧体制；以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的改革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面貌，也是一种革命。甚至对一种产品进行突破性的改进，也是一种“革命”，不过只是范围很窄的“产品革命”（产品的“革命”这一名词，在广告语言上用得甚多）。

为什么过去一提“革命”就习惯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呢？这有其社会根源：在生产低下、文化不发达与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阶级要维护他们的既有利益，或者要打破对他们不利的现有制度，往往需要一种强力的行为，并且最终以暴力方式谋取最后的胜利。资本主义建立初、中期，包括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就是靠暴力对暴力。那些非暴力行为（如议会斗争）所起作用还不大。把暴力与革命相联系，还有一个文化根源：那就是近百年的理论争论的结果。许多人都把暴力革命论看作是主流，把非暴力革命论看作是次流，甚至是逆流了。

直到近十余年，由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人们对利益的看法已有所变化。许多人知道，取得经济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用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达到增加自己利益这种方程式了（用《资本论》的语言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攫

取），也不是用固定别人的生活水平而由自己独占社会经济进步的成果（或叫“相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最高明的办法是用发展新科技和发挥群体力量（即所谓“杠杆效应”的先进管理形式）来增加社会财富，然后与总体社会成员共享——不过自己那一份蛋糕却要比别人多一些，甚至多出许多，因此他还是社会的统治力量或精英分子。

这里的先进科技与先进管理方式的采用，也应是一种“革命”，即革掉落后的生产程式、革掉社会上许多摩擦的成因、革掉社会上许多落后的因素。约翰·洛克菲勒要的就是这种“革命”。

(四) 香港需要“静静地革命”

香港，再过三年就主权回归了，而且是五十年不变。香港，虽然是个繁荣的社会，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是为世界许多人羡慕与奉为榜样的社会，但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当中不少地方还需改革。有些地方改革度还可能较大（如殖民地的陋习、贫富悬殊的社会形态）。因此，主权回归后，也不必讳言“革命”，不过要的不是暴力式革命，或起着破坏作用的革命。香港需要的是“静静地革命”。美国社会上层分子的洛克菲勒，都可以大谈特谈革命，为

什么香港人自己却不敢谈革命？我们可以进行健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这个“健全”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更合理分享，社会制度上的更多民主与法制，社会意识上更多的互助与尊重，而且要用更多的渐进方式与协调的方法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一书中，有一段描述当时法国社会情况的“跨世纪名言”，为后人经常引用：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世纪，那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那时我们面前什么都有，那时我们面前空无一物。”

约翰·洛克菲勒用这段话来形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如果不抱成见，用这段话来形容香港也颇为合适。香港有她巨大成就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用“静静地革命”的方式来消除她的阴暗面，使她的光明面更加发展，使香港社会更加完善，应是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大任务。

〔责任编辑：孟庆顺〕

（上接第 31 页）经济的长远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的经济和货币改革将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欢迎，此有助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这些都在数方面有利于香港。④但不容否认，大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胀，贸易赤字增加等问题亦会在短时间内对香港股市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 香港作为大陆筹集外资重要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吸引外资竞相前往投资，但投资大陆的渠道不多，内地股市还不完善，且集中在深圳与上海。地处中国南大门的香港自然扮演了替中国集资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外资借港股投资大陆，作间接投资的活动在 1993 年第四季度达到高潮，因而极大地繁荣了香港金融市场。

3. 英方挑起的“政争”对外资影响不大。英方坚持“三违反”立场，极有可能影响中英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排除有短暂金融波动的发生。而外资显然不会受此所左右，这正如有的外资证券行人员所说的，外资投资香港时早已将香港风险融入中

国风险内计算，只要中国仍有投资前景，外资对香港市场的态度就不会改变。⑤

鉴于上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因素长期支配港股走势，中国因素看好，港股攀升必定有支持。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作为国际上重要的资金集散地，香港股市对国际及本地的诸多因素极为敏感。全球股市及各地利率走势、经济水平、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等都会对港股构成冲击。更何况股市风云变幻不定，投机性色彩相当浓厚。所以，强调中国因素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其他与港股相关条件的变化发展。

注释：

①参见拙文：《香港 H 股初探》，载《港澳经济》，1994 年 4 期。

②香港《信报》，1993 年 10 月 1 日。

③香港《大公报》，1993 年 12 月 30 日。

④香港《明报》1994 年 1 月 7 日。

⑤香港《快报》，1993 年 12 月 3 日。

〔责任编辑：周运源〕

香港人口的郊区化

李若建

香港是一个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因为填海造地，面积每年均略有上升），在这么小的范围内，许多地区是还不适合人们居住的丘陵、山地和荒岛，因此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使这些地区高楼林立，人口密度极高，也使得这些地方地价昂贵。作为住宅用地，在市区中心其地价高得惊人，为一般市民所无法承担。

香港是一个贫富悬殊，并且社会福利比不上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的地方。有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没有自己的房子，只能挤在一些被称为“木屋区”的贫民窟，这些地方房屋破旧，生活设施差，人口密度极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港英政府较早就有一些把人口疏散到郊区的设想。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侵占，这些设想就搁置了。到了 50 年代，由于大批人口涌入香港，而使香港市区人口挤迫问题空前尖锐，因此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人口从稠密的市区疏导出去，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基本上控制了市区中心人口恶性膨胀，使得一批卫星城镇欣欣向荣。香港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同样为市区人口膨胀所困扰的中国内地大城市借鉴。

港英政府最早改变人口分布的计划，是“徙置区”的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口激增，房屋空前紧张。由大陆来到香港的移民中，除了少数腰缠万贯的富人及高级政客外，大多数是一般百姓。平民百姓中有一部分人可投亲靠友，求得安身立命之地，大部分人被迫靠自己双手搭建一些简易木屋（这种木屋至今仍然存在）。当时在香港不少地区，木屋成

片，其中仅调景岭一带就有数万人居居于简易木屋、茅棚之中。这类简易建筑的材料极易着火，一旦失火就很容易火烧连营。

港英政府于 1948 年就曾尝试解决人口过于集中在香港岛的问题，提出了“徙置区”计划。当时的计划很简单，主要措施是把市区中心空地（大多数是经战争摧毁的房屋旧址）的居民迁往近郊的暂不进一步发展的地区，这些地区当时被称之为徙置区。当时在徙置区的人口很少，并且谈不上有什么设施。

真正的、大规模的徙置区计划起源于一场大火。1953 年圣诞节之夜，位于新九龙一带的石峡尾发生了场大火，在数小时之内，使 5 万木屋居民无家可归。5 万人，相当于当时香港人口的 2%，由此可见这场火灾影响之大。为了安置灾民，港英政府在 1954 年初兴建了多座七层楼的徙置大厦，将无家可归的灾民安置收容，由此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徙置区建设和安置木屋区居民计划。原定徙置区计划于 1966 年完成，后来因为中国内地三年困难时期有大批人口流入香港，再加上住在木屋区的人口有较高的自然增长，使得政府的徙置区计划拖延到 70 年代初才结束。

表 1 是历年徙置区的人口数量，从中可以看出，徙置区计划进行最快的时期是 60 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十余万人搬进徙置区。到了 1971 年时，被徙置的人口高达 120 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 30%，由此可见该计划的实施，对香港的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港英政府在徙置区的选址上是考虑得比较合理的。政府有意把徙置区放在当时的郊区位置上，这

种布局可能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减轻人口已经过分挤迫的市区的人口压力；第二，当时香港的地铁还未建成（地铁是 1980 年通车），市内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因此不可能把徙置区建得太远离市区。不过随着城市的扩展，当年环绕市区分布的徙置区，现在大部分已经和城市连成一体。1971 年居住在徙置区的人口分布如下，香港岛占 10.8%，九龙占 25.1%，新九龙占 49.0%，新界占 15.1%，也就是说，大约半数的徙置区居民被安置在新九龙。虽然在香港岛与九龙均有一些徙置区，这些徙置区一般也在其边缘地区，例如港岛的柴湾徙置区位于香港岛的最东边，石排湾与田湾与港岛的市区有一山之隔，九龙的几个较大的徙置区实际上都在市区边缘。

表 1 香港徙置区历年人口数（万人）

年	人口	年	人口	年	人口
1954	11	1961	42	1976	102
1956	20	1962	57	1968	108
1957	22	1964	74	1969	112
1958	27	1965	80	1970	114
1960	31	1966	96	1971	120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的《香港年鉴》

1971 年在新九龙徙置区的人口近 60 万，大约相当于该年新九龙人口的 40%。在 1946—1971 年间，香港的人口流向是新九龙。据 1961 年人口普查，新九龙人口 85 万人，占全香港人口的 27.7%；1971 年人口普查时，新九龙人口 148 万，占全香港人口的 37.6%。新九龙人口剧增，在很大程度上是徙置区的建设所致。

1955 年港英政府在新界荃湾范围内的大窝口设置了新界的第一个徙置区，随后又在新界陆续建了一些徙置区。尽管在徙置区计划中，新界地区占的比重不大，不过也反映出港英政府开拓新界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到了 70 年代就发展为新市镇政策。

在徙置区计划中，港英政府基本上是采用逐步

扩散的方式进行。最早的徙置区设置在旧市区的边缘，再建设的徙置区则设在旧徙置区的外围，并且有意向新界的荃湾一带发展，更远的发展到了新界西北的元朗和屯门一带，这种循序渐进方式，基本上适应当时的交通水平，也使整个徙置区计划较为成功。

尽管在徙置区的设置与安顿过程中，有某些不足，不过港英政府还是比较注意配套设施的完善。在各个徙置区均有私立学校，有些新区（60 年代后期的徙置区改称为新区）设有官立小学，新区的学校大多数由政府补助，多数新区设有诊所。在徙置区内建成工厂大厦，经营厂房面积不超过 5 千平方英尺（折 464.5 平方米）的小工厂，可以迁入徙置区的工厂大厦内。位于被清除地区的小店，在满足一定的要求下，也可以迁入徙置区内营业。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把原住地的居民尽可能整体移到一个新环境，有助于居民适应新环境与方便生活。

香港政府首先在 1953 年把九龙的观塘开发为卫星城，在该地区发展工业。50 年代后期才开始研究在新界拓展卫星城的可能性。荃湾在 1960 年首先被命为新市镇，1964 年屯门与沙田又正式成为新市镇，1979 年将大埔、元朗、粉岭、上水、石湖墟正式命名为新市镇。根据港英政府 70 年代完成的一份“香港发展纲领”，新市镇的人口目标分别为：荃湾 90 万、沙田 55 万，元朗 8 万，粉岭—上水—石湖墟 17 万。

表 2 香港新界各地区人口增长情况（万人）

地区	1971	1981	1991
荃湾	26.6	59.9	69.5
屯门	2.1	9.0	37.3
元朗	2.1	5.1	22.5
上水/粉岭	3.2	5.0	16.2
大埔	2.1	4.0	19.8
沙田	2.4	10.9	49.4
其他地区	28.1	36.4	17.4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表 2 是 1971 年以来，新界各个新市镇的人口增长情况，从中可知，近几年来，香港新界的人口增

长,是新市镇的人口增长,其他地区的人口并无增长。在 1971—1991 年间,香港新市镇人口增长率非常高。以新市沙田为例,1971 年沙田只是一个 2 万多人的小镇,1991 年时人口已经接近 50 万人,人口增长了 20 倍。

港英政府能够在短短 20 年内,把整个老市区(包括香港岛、九龙、新九龙)的人口控制住,使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从 1971 年的 319 万,到 1991 年时人口还是这一数目。同期,新界的人口则从 67 万增长到 238 万。这意味着,1971—1991 年间,香港的所有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全部被新市镇所吸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港英政府新市镇的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香港原有的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甚至高到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例如,1961 年港岛的人口密度为 1.6 万人/平方公里,九龙与新九龙的人口密度为 3.9 万人/平方公里,在九龙的尖沙嘴一带,人口密度更高达 5.5 万人/平方公里。住在狭小拥挤环境中的居民,似乎比较喜欢外迁。再有,许多早期建设在新九龙等地的徙置区,住宅设备简单,仅有公共浴室和厕所,随着香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这类建筑日益显得过时,当然,仅上述因素仍不足以让人口迁离市区,住进卫星城。中国内地许多大城市的老市区,早已人满为患,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乐意移居卫星城,恰好与香港情况相反。

第二,港英政府在建设新市镇时,注意生活服务的配套,使居民迁入后不会感到生活不方便。例如,新界的许多公共屋村,在几栋居住大楼之间,设立走廊通道,就是刮风下雨,住户均可以不打伞到商店与车站。

第三,新市镇的选择地点合适,交通方便,在香港最大的新市镇荃湾,有地铁服务。在沙田,水上一线的新市镇,有电气火车与地铁联网,居住在元朗与屯门新市镇的居民则靠高速公路与轻便铁路与市区连接。除了屯门一带因为高速公路车多之外,大多数新市镇居民,并不会感到交通不便。

第四,注意规模效应,香港的新市镇一般都拥

有较多的人口,如荃湾人口超过 60 万,沙田人口 50 万,按中国内地标准,算是中等城市。1991 年人口资料表明,最小的新市镇,人口也有 16 万。由于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超过了常说的“门槛人口”(维持一定水平服务所需的最低限度人口),保证了服务业能在新市镇有利可图,正常经营。卫星城的规模太小,服务设施不配套,往往是中国内地卫星城市建设失败因素之一,香港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五,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地价由其使用价值决定。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和人口增长,在市中心地价高得惊人,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市区的楼价是个天文数字。工薪阶层要买房只能到楼价低一些的新界去买。香港的住房紧张,住房价格偏高,许多居民买不起住房,如果租赁私人楼宇,租金昂贵。港英政府把房租低廉的公屋建立在新市镇,使那些买不起私房,又不想高价租房的人,不得不搬到新市镇。

住房对香港人口郊区化的影响从 1976 年人口普查的一项调查可以证实。对 22.2 万在香港内部迁移者的调查表明,为住房、便宜租金和拆迁而迁移的占 42.9%,而为工作迁移的仅仅占 17.1%。另据一项新市镇屯门所做的调查,迁入屯门的人口中,59%来自港岛、九龙、新九龙等老市区,21%来自邻近最早建立的新市镇荃湾。迁入的原因按照人数多少依次为:原居住地的空间狭窄,原居住地的环境恶劣、原居住地的危楼搬迁、原居住地的租金上升,工作地点变更等。从这两个调查可以看出住房对香港人口郊区化的影响之大。

第六,工业布局的改变。一些新市镇建立了工业区,如荃湾的葵冲和青衣一带有发达的港口运输业和仓储业,在大埔和屯门有工业区。在屯门工业区里有 2 千多家工厂,提供 3.6 万个工作机会,60% 的工人就住在屯门。

第七,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西方国家的人口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从市中心迁往郊区,在香港也存在类似情况。根据 1986 年香港普查资料,在香港的内部人口迁移中(主要是从市区迁往新市镇),收入高与文化高的有明显优势。

从表三中可以看出,在各个家庭收入分组中,无迁移的人口中低收入的比重高一些;而在有迁移的人口中高收入的比重高一些。例如,在无迁移的人口中,60.1%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足 3 千元;而在有迁移的人口中,这一比重只有 48.1%。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一是高收入家庭有钱买房,可以搬家;二是港英政府规定,要申请公屋要有一定条件,如在香港居住时间长短,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等等,这样使许多从中国内地新迁居到香港的新移民无法申请公屋,这样低收入的人迁移就少些。

表 3 1986 年香港内部迁移者与无迁移者的收入分布(%)

家庭人均月收入(千元)	迁移者	无迁移者
<1	5.4	6.8
1—2	16.4	22.5
2—3	26.3	31.2
3—4	21.0	18.3
4—5	10.7	7.9
5—6	6.0	4.3
6—8	6.6	3.9
8—10	2.4	1.9
>10	5.2	2.4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香港 1986 年人口普查资料

表 4 1986 年香港内部迁移者与无迁移者的学历分布(%)

学历	迁移者	无迁移者
小学及以下	47.7	49.9
初中	20.1	18.9
高中	20.8	20.7
大专及以上	11.4	10.5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香港 1986 年人口普查资料

表四是迁移者与无迁移者的学历分布,从中可以看出在无迁移人口中,小学以下学历占 49.9%,而迁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 47.7%。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口,迁移者占的比例均高于无迁移者。香港是一个讲学历的社会,学历与收入往往相关,高学历者迁移多,实际上是高收入者迁移多的表现。

香港的人口郊区化,由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中收入较高的人迁往新市镇,使得老市区一些地点,成为新移民的集中地,如九龙的旺角,港岛的北角等。这些地区居民收入一般偏低,如 1986 年,旺角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低于各新市镇(元朗地区除外),不过差别不算太大。从总的来看,香港的新市镇是相当成功的。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卫星城市建设成功极少,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一下有关的政策和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新市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责任编辑:黎熙元〕

(上接第 51 页)

②杨耀林:《深圳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年代分期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③李子文:《珠江口沙丘遗址的考古实践与认识》,《广东省博物馆刊》,第 2 期,1991。

④李岩:《环珠江口史前遗存陶器编年试析》,《东南文化》,1992 年第 5 期。

⑤严文明:《珠海考古散记》,《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⑥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⑦甄燕:《试论史前南海地区的沙丘和贝丘遗址》,《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⑧吴曾德、叶杨:《论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区域文化》,《考古学报》,1993 年第 2 期。

⑨见⑦

⑩见④

⑪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邓聪、黄韵璋:《大湾文化试论》;任式楠:《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均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的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⑫见⑩

〔责任编辑:孟庆顺〕

论澳门成为百万人口的国际都市

郑天祥

一、国际性都市与都市规模

都市规模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反映。国际性都市要求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它的国际性越强，规模越大，其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大，不过，都市的国际地位主要由都市性质和作用来决定的。澳门不应刻意去追求百万人口规模，而应着力发展文化与经济，其人口也就随之而增加。世界上有许多百万以上人口的都市不具有国际性，它们是效率不高的城市，而一些不足百万人口的都市，其国际地位却十分重要，如日内瓦、苏黎世等，它们是效率很高的都市。

二、人口规模的适度性

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规模息息相关。就业、水、土资源与能源、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与人口规模相关。例如，一般来说，要保持较好的居住环境，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需要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即使是高密度发展也需要四、五十平方公里，再小的话，环境就会很挤逼，甚至恶劣。澳门现时只有约二十平方公里面积，要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一百万人口，至少要填海二、三十平方公里，是否可行？扩大辖区范围，牵涉到与珠海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至少是 1999 年以后才能讨论的事。

澳门缺乏的一些资源，如水资源、能源、农产品等，可从区外进口，其对人口规模的制约程度比较低。不过，澳门要增加 60 万人，就要增加 30 万个就业岗位、35 万个学位、15 万个居住单位及医院床位等各种设施，这些建设有个过程，还有投资问题，其制约性就比较大。

三、澳门成为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必要性和期限

确定澳门人口合理规模不能单从地产、商业发展等局部需要来考虑，应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与功能分工来考虑。邻近澳门的东部有一个六百万人口的香港，它是国际航运、贸易、旅游、金融、信息中心，目前澳门没有必要与其争夺这些国际中心地位。澳门周边地区是珠海市，它发展工业的水、电、土地、劳工及市场条件都比澳门强，澳门没有必要和可能与珠海市竞争发展一般的工业。澳门应发挥其与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关系，以及自由港、出口配额等优势，建成珠江三角洲西部的服务中心，包括贸易、金融、信息等服务，也可适当发展较高层次的科技产业，至于旅游博彩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澳门的支柱产业。这样看来，澳门并不需要大量的一般劳工。提高人口素质，吸引高素质人口移入比大规模移民重要得多。澳门政府应制定鼓励专业人士到澳门定居的政策。

我们以澳门 1991 年 41 万余人为基数，包括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每年增加 2 万人，至 2001 年澳门总人口超过 60 万人，2011 年超过 80 万人，2021 年超过 100 万人。澳门要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至少是二、三十年渐进的过程。政府应根据人口增长过程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移民政策，避免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次人口大变动的动荡。

〔责任编辑：陈丽君〕

• 本文是作者在 1994 年 9 月 3 日澳门大学主办《澳门发展的人口条件与人口政策》会议上的发言。

四十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争执

史言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政府曾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过谈判；战争结束时，两国又在香港日军受降权问题上发生针锋相对的争执。本文拟对此作一粗略探讨。

一、“平等新约”谈判中的香港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殖民统治的根基发生动摇，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香港主权问题的历史背景。当时，英国占领香港刚满一百年。

1941 年 12 月，香港英军战败，这个殖民地落入日军手中。此时，英国朝野人士对于战后香港的命运已提出了疑问。殖民地部高级官员考虑战后香港政策虽仍以恢复其统治为基点，但被一些人提醒：必须改变昔日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作风，改善与当地中国人以至中国政府的关系。

英国首相丘吉尔感到极不愉快的是，要英国人在战后放弃香港统治权的，首先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1942 年夏，英国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外务次官格善理到美国访问，美国政府高层人士表示，如果中国要求收回香港，会得到他们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英国殖民地部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殖民地次官郑艾华对美国人的意见大为不满，他强调在制定战后英国远东政策时，不应以美国的观点为根据。在一次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联席会议上，格善理主张英国“断臂保身”，放弃香港；而郑艾华则认为，英国不应放弃对领土的责任。

英国政府在起草关于战后香港基本政策时，面

对着各种自相矛盾的考虑：

第一、既要顺应废除殖民制度的世界潮流，又不愿意放弃香港这块殖民地。

第二、承认香港在地理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不同意将该地的主权交还给中国。

第三、要与美国一起扮演“废除在华特权”的角色，又想将香港问题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

第四、如果不得不将香港交还中国，则应要求在中国沿海获得新的其他利益。

第五、强调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但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坚持强硬态度。

1942 年，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时刻，美、英两国都需要和中国更加友好合作，共同战胜法西斯。这时，中国政府和美、英两国政府分别进行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英国政府是在美国政府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采取这一行动的，谈判内容包括取消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香港问题很自然会提到议事日程。

11 月中旬，中方向英方提出，新界“租借地”问题应列入谈判范围之内。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说明，新界属于租借性质，应与其他租界视作同一类别；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谈判内容只涉及中国领土内的租界问题，新界是英国属土内的特权问题，不应包括在内。中方明确向英方提出，一份不包括新界租借地问题在内的中英条约，中国政府是不会签署的。12 月，中英谈判触礁，礁石就是香港问题。据说，蒋介石还坚持要收回香港。当时在重庆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也反复与英方代表洽谈这个问题。他回忆说：“宋子文找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条约如果不包括收复香港，委员长是不会同意的。”^①对此，丘吉尔则采取了强硬的对抗态度。

中英条约的谈判，因香港问题而陷入僵局。但中美谈判则顺利进行，并决定于 1943 年 1 月 1 日签字。英国政府指示它的谈判代表，力促在 1942 年底解决分歧，以免使英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中国政府首先作出让步，但这个让步因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而拖延了许多时间。直到 12 月 31 日，宋子文才通知薛穆，中国政府同意不将新界租借地问题列入“平等新约”，但保留日后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于是，中英两国在 1943 年 1 月 11 日签署新约，废除英国在华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其中包括取消所有租

界,但没有解决香港问题。

据资料披露,中国政府曾告知英方,中方可以同意在这次谈判中不讨论新界问题,把它留待战后解决,但英方必须保证在战后交还新界。英方的立场是,可以同意在战后和中国政府洽商新界“租约”问题。蒋介石一直坚持收复香港,而不仅仅是新界。至于中方在谈判中没有提及香港主权问题,只是一种外交策略。英方当然闭口不谈香港问题,就是新界问题,也十分小心地局限于“租约”范围,不作出任何归还的承诺。②

这次中英争执,以中国让步而暂告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中国政府决定,将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

二、香港日军受降权问题的争执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商讨战后世界问题。会上,苏联首脑斯大林提出了香港问题。据丘吉尔回忆:“斯大林说,假定中国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斯大林说他担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③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香港的日本占领军亦接到天皇训令,向盟军投降。按照日本天皇的训令,所有的日军应就地向盟军所属军区将领投降。香港日军属于南支派遣军第23军所辖,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的是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司令部设于广州。战争期间,盟军未有将香港地区列为特别战区,更不属于蒙巴顿指挥的英军东南亚战区。中日双方都将香港作为广东战区的一部分。而中国军方负责广东地区最后作战的是第二方面军。根据日本天皇训令,田中久一及其所部(包括香港占领军)应向中国第二方面军投降,受降将领应是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日本投降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洽降使节今井武夫呈交的日军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系统等资料,分配受降任务。何指示张发奎: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的第1号命令所划定的受

降区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越南北部、台湾和香港。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香港明确划归广州受降区。张发奎说:“我接受了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等地的受降官任务。”④张拟定的受降接受计划包括下列内容:“第13军(欠89师)继新1军后,即沿梧州、三水、广州推进,以主力配置于广州(不包括市区)至九龙之广九铁路沿线,以一部推进香港,监视该方面之日军,及受降实施。”⑤

可是,深谋远虑的英国政府,在日本未投降时,已秘密派出一支舰队驶近南中国海。日本投降前一天,英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决定,如日本投降,立刻派军舰前往香港接管。

8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吴国桢,递交了英国外交部照会,告知中方,英军将进入香港。

8月16日,吴国桢召见薛穆,转达中国政府意见,要求英方在接受日本投降时,遵守盟军统帅部第1号命令,在未得到盟军统帅和中国战区总司令授权时,不派军队进入中国战区的任何地方。同日,吴国桢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转交一封蒋介石给杜鲁门总统的信,指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范围,请美国政府提醒英国不要违反盟国的协定。

8月17日,薛穆再次会见吴国桢,表明英国政府“自行收回失土”的立场。

8月18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国支持英国。杜鲁门复电说,只要取得中国同意,美国不反对英国接收香港。

8月19日,英国大使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认为香港不属中国军队接收范围。

8月20日,英国大使通知中国政府,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已同意由英国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蒋介石立即再致电杜鲁门,要求澄清美国的立场,并指出:如果随意改变盟军统帅部的命令,制造不良的先例,会在香港以外的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应遵守命令,撤回派往香港的军队,打消在这一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企图。电文还说,如果杜鲁门总统已经同意英国的要求,为了不使总统为难,我将邀请美国和英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在受降之后,再由我授权英国军队登陆重新占领香港。但香港日军必须向中国战区总司令的代表投降,中国方面作

出上述让步是不得已的。杜鲁门复电蒋介石,提出两点:第一,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样看来,日本人在香港向谁投降,只是一个军事行动问题。由于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是合理的。第二,希望蒋介石接受劝告,与英国人取得军事行动的协调。

当8月21日蒋介石下令第二方面军接受广东战区日军投降时,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科特率领的一支以航空母舰“不屈”号为首的舰队,已开向香港。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杜鲁门,表示中国可再作让步,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身分授权英国军官代表他接受日军投降,请英国方面同魏德迈(美国派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协调此事。杜鲁门同意这个方案。

8月24日,蒋介石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内容大意是:中国政府不会趁日本投降的机会,派兵占领香港,也不会破坏国际条约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但应当指出,既然所有的外国租借地和租界都已经一个一个地交还中国,九龙租借地也不应例外。中国政府将会透过外交途径与英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蒋介石重申,香港日军由谁受降问题应依据盟军统帅部规定执行,香港主权问题可留待日后商讨。25日和26日两天,英国驻华大使要求会见蒋介石,均未获见。

8月27日,蒋介石第四次致电杜鲁门,表示中国已不能再让步。他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身分通知英国,授命英军将领哈科特为他的代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8月29日,英国大使通告中国政府,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个方案,拒绝这种授权。英国大使再次要求会见蒋,被中国外交部长吴国桢劝止。

8月30日,英国大使薛穆和英国首相驻华特别代表魏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坚持原有立场,认为英军将领只能接受他的指令去执行受降任务。就在这一天,哈科特率领的英军舰队进入香港,抢先登陆。据张发奎透露,美国人告诉他,英国人怕中国军队入港受降造成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事实,所以,不待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同意,就违反命令抢先动手了。正在部署接收香港军事行动的张发奎,突接何应钦电令,停止向香港进军。当时,参与协助中国军队进入香港的美国军事人员,对英国人的

这一举动,也大为不满。

9月16日,英国海军少将哈科特代表盟军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中国将领潘国华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仪式。蒋介石没有被当作香港隶属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权完全由英国人掌握。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当时的中国政府是有意收回香港的。蒋介石曾说,只要香港仍在英国手上,中英两国就不可能建立友好关系。当1945年8月中英就香港日军受降权问题发生争执时,蒋介石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英国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式的,与联合国成员的资格极不相称。直到1946年6月13日,蒋介石在一次宴会上,还请薛穆转告英国外相贝文,香港问题能够解决,中英关系才可以和谐。⑥但在当时中国国力衰弱的历史情况条件下,这个意愿始终未能实现。

英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中,对香港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占主流的是“决不放弃”。丘吉尔曾向赫尔利表示,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⑦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英国政府,对待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态度与方式,当然以它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无论是遵守或违反,都尽量做到“有理”并取得国内外支持。

在中英两国争执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当然是实用主义的,主要服从于它当时的全球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时刻,需要稳住中国,又要扮演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角色,还企图填补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因此,曾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并向英国施加压力。但战争结束时,世界格局起了根本变化,它便放弃了原先所采取的立场。

历史是一面镜子。

注:

①⑥⑦《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14—16页,574页,579页。

②有关资料参阅英国政府档案署《殖民地部档案》及《外交部档案》。王世杰主编:《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7年10月出版。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③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21至522页。

④⑤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5辑,第72、7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责任编辑:朱德新〕

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在中西科技 文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上)

邓开颂

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租借澳门。澳门很快成为中国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和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交汇点。本文仅以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科技东来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产品西传为例,说明澳门在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起过的重要作用。

一、澳门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澳门是西方科技及人才传入中国的入口
十六世纪中叶,可以说天主教耶稣会教派的传教士几乎与第一批葡萄牙人同时登上澳门。据记载,1561年已有两位传教士定居澳门。1563年,“耶稣会教士增至八人,驻澳葡人亦有九百余人”^①。1567年,澳门升格为主教区,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据统计,从1557年至1644年,澳门的天主教徒便从400人发展到4万人。

157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抵达澳门。在潜心研究中国国情及典章制度后,悟出教会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比教会本身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单纯的传教决不能改变中国数千年来儒家宗法伦理礼仪为核心,以儒、佛、道多元思想为架构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习惯、风俗民情,必须选择有才能的传教士长期居留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深入社会各阶层,取得统治阶层的信任和支持,从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入手,方能有效地“…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②。基于这一决策,自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起,许多著名的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几无例外地都分别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机械、物理、地理、美术、音乐、工艺等方面,各挟有一技之长,各掌有专门之学,而且还带来大量的图书资料和器物成品,以之奉献给万历皇帝及其后妃,交结各级官僚人士,尽可能扩大影响,逐步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博得上至部分皇族,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的信

仰”^③。据统计,1581—1740年六十年间,“从澳门进入中国的483个耶稣会传教士来看,葡萄牙人有174人,其它外国人共289个,其中至少有62名意大利人”^④。

(二)澳门是向内地输送科技知识和人才的大本营

澳门既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是这些饱学之士等候明清皇帝批准进入中国内地前熟习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应运而生的三巴寺(即圣保禄学院)(1594—1835年)担负了这培训重任,设有神学、中文、葡文、拉丁文、数学、天文、音乐及东方仪礼习俗等课程。最兴盛时期曾拥有学生二百多人,驻院任职的耶稣会士亦有59名之多。其中,查之有据先后在澳门三巴寺寓居的“耶稣会士有88人,其中葡籍12人,葡籍28人,意大利籍21人,法国籍14人,比利时籍3人,其它6人。……葡籍会士中有学者孟三德、苏如望、费其规、哲学家安文思及历法专家林安多、徐日升等;意大利籍会士中的利玛窦、郎世宁及法学家范礼安、罗明坚、汉学家宋君荣、钱德明及历法家蒋友仁,德籍会士的汤若望及比利时籍会士中的南怀仁”^⑤。

明清政府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康熙亲笔改过的一道上谕曾明确指出:“传旨与众西洋人,……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俱不会中国的话。……朕意,且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⑥并且严格筛选来华的传教士,择优录用有科技特长者,尤其康熙当政期间更亲自掌握,多次下旨广东督抚派人到澳门查核,“见有新到的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⑦。即使已送到京城的人员,康熙也注意认真检查考核,鉴定是否有真才实学和水平高低,方决定取舍。

在澳门居留等候传召的耶稣会士不仅把西洋著作原本引进中国,同时在三巴寺里翻译成中文、编纂词典等。“学者们研究,认为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兵法、火器、生物、医学、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等,都是从澳门经三巴寺传入中国。在这过程中,拉丁文传入中国为汉字注音亦始于澳门。……至于汉字西播方面,除三巴寺通过每年年报广泛报导中国外,主要是在寺内开展对汉学特别是儒家学说的深入研究,将中国典籍译成西文,编辑中文字典以及将中国庭院园林建筑艺术引入欧洲”^⑧。

(三)澳门是中西信使往来的中继站及西方传教士被逐出中国的流放所

由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一半说道,一半论当时科学”,加上明清政府着眼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对于愿意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只要不干扰公务、不与中国传统相抵触,其态度也比较宽容,因此,天主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到1664年(康熙三年),接受洗礼的耶稣信徒已达246400人,遍布全国十一个省。此外,还出版了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几十种。天主教的其它教派,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也通过澳门来华开教施洗^⑨。

然而,以龙华民为代表的一部分耶稣会士恃仗罗马教廷的支持,从一开始便反对这种天主教中国化的做法,一再攻击中国教徒保持祭天祀祖尊孔习俗有悖教义,在传教士内部引起一场“礼仪之争”。由于罗马教廷插手干预,导致中国封建皇朝与罗马教廷的正面冲突,以天主教被禁止在中国继续传播而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争执辩论,正是“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澳门以弹丸之地,却因其具有的地区特点,在此一重大事件中,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⑩。

首先,澳门成为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互派使者来往的中继站。在“礼仪之争”爆发前,来华传教士仅受某一教派教会派遣,从来没有以罗马教皇使者身份进入中国与皇帝交涉。及至1704年教皇格勒门十一世颁布对中国教徒的七条禁令,次年由多罗主教带到中国觐见康熙,要求中国政府转饬教徒服从禁令,这是西方教会与东方皇权的首次正式交涉。康熙为此多次召见多罗,亲笔对禁令逐条加以驳斥,

不允许罗马教廷以宗教权力干预和限制中国臣民的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⑪。由于双方观点势如水火,故多罗此行毫无结果,快快出京,南返澳门,直至1710年客死澳门。罗马教廷的第二位使者嘉乐主教于1720年来华,同样未能说动康熙接受禁令,却只得康熙御批,“今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⑫。嘉乐只好在第二年返回澳门待命。围绕“礼仪之争”,康熙多次派遣在华教士为信使经澳门专程往罗马,向教廷申明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雍正登基后,更加紧实行禁教政策:“将各省(传教的)西洋人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⑬。罗马教廷于1725年再派使者来华要求弛教禁,但丝毫未曾动摇雍正禁教方针,仅再次复函罗马重申禁教的必要。从此,清朝与罗马教廷的交涉便告中断,礼仪之争也不复再有,澳门成了被逐出中国的西方教士的流放所。除在钦天监供职的戴进贤、徐懋德等20人在不得传教的前提下仍留用外,其余在华传教士近百名分别于1724年、1732年被全部驱逐到澳门。(下期待续)

注释:

-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
- ②裴化行:《利玛窦习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第3页。
- ③④参见韦庆远:《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我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韦庆远教授无私地给我提供一批极有价值的康乾时期关于科技方面的档案资料,深表谢意。
- ⑤参见诺奥·巴斯多:《十七世纪葡国为建造北京两座最早的耶稣会教堂所做的贡献》,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期,“澳门文化学会”1987年第四季度出版。
- ⑥⑧黄汉强:《研究澳门、服务澳门》,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期,“澳门文化学会”,1987年第四季度出版。
- ⑥《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五件,《谕众西洋人》。
- ⑦《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701—704页。
- ⑧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375页。
- ⑨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4件,《禁约》译文。
- ⑩同上,第14件,后朱批。
- ⑪《东华录》,卷十二,第14—42页。

〔责任编辑:朱德新〕

港澳地区史前时代沙丘遗址的分期及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

商志禪 李 果

在我国考古学领域中,香港地区的考古,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到目前为止,香港已发现 137 个古文化遗址地点,并发掘了 23 个史前文化遗址。大量新考古材料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对香港古文化面貌有所了解,而且表明这些古文化在整个中国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

香港考古工作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香港考古工作的开展,可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最早发现香港史前遗物、遗址的是就职于港英政府医药卫生机构的英国医生韩义理(Heanly)。1928 年,在《中国地质学学会志》第七卷上,他撰文公布了香港发现的史前石器。1932 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一次东亚史前学家会议”上,他又与香港大学解剖学教授肖恩维(Shell Shear)联合发表《香港和新界史前史来稿》^①,揭示香港有史前时代的遗物发现,一扫香港没有史前文化的错误观念,引起人们的重视。

如果说,这个时期是利用闲暇的时间在郊外,尤其是香港沿海近河溪出海口周围的山丘上,寻找和采集先民的遗物;那么到了 30 年代则在香港沿海岸的沙堤上进行发掘了。1932 年香港大学地质系的爱尔兰人芬·戴礼神父(Fr. D. Finn)发掘南丫岛(旧称博寮洲)的大湾遗址^②,1937 年港英政府理民官员史戈斐倡(Schofield)发掘大屿山(旧称大濠岛)石壁的东西湾遗址^③,这种作法与采集来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阶段始于 70 年代,其主要特征是考古发掘方法的变化。香港深湾遗址的发掘所使用的是以土色土质来分地层的方法,它比前一阶段以水平深度

的发掘方法,可以说是在质量上的进步^④。这种发掘方法对分析香港考古学的序列分期、年代推定和研究文化内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这个阶段,仍然由业余考古的外国人来主持发掘,还残留着部分遗址使用深度发掘的方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到 80 年代,本地一些从国外学习考古学的人员回到香港,并陆续主持田野考古工地的发掘,不仅使香港的考古工作提高到专业发掘的水平,而且对与香港远古文化具有文化渊源关系的祖国大陆的考古学文化给予极大的重视,使香港考古学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由于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的采用,在层位学的基础上,利用 C¹⁴和热释光等手段来测定香港的考古学年代,这样使研究香港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有了可能。

首先在 1976 年英国传教士秦维廉(William Meacham)认为深湾 F 层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⑤。1986 年他进一步将新石器时代中期又细分为早晚两期:第 I 期为春坎湾期(4500—3500 B. C);第 II 期为深湾期(2900—2700 B. C)^⑥。

其后邹兴华先生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的 C¹⁴测定的 54 个数据,其中也包括香港的 37 个数据,将新石器时代中期分为早中晚三期。第 I 期为 4500—3700 年(B. C),以香港的蟹地湾底层和涌浪②B 层、深圳的大黄沙④层为代表。第 II 期约 3700—2900 年(B. C),以香港的东湾④层和长洲西湾、南海的西樵山锦岩③层、珠海的草堂湾⑥层为代表。第 III 期在 2900—2200 年(B. C),以香港的龙鼓上滩③层和涌浪①B 层、珠海后沙②、④层为代表。在他的文章中,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岩样本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表》明确地将秦氏分为

早晚两期的春坎湾期和深湾期,皆归入他的第 I 期,这是根据 C¹⁴树轮校正年代春坎湾为 3660—2925 年(B. C)、深湾 F 层为 3350—1870 年(B. C)两者年代相近的缘故^⑦。

那么香港有没有更早的考古学文化?

邓聪先生认为东湾 I、II 期可能是香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文化。东湾 I 期,在东湾遗址的(89)TH 及 I_{1,2}底部发现的石器群,与广西百色发现的打制石器极其接近^⑧,而百色石器的时代可订为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⑨,估计年代距今 6000 年前^⑩。

其实在这之前,郑德坤、邓聪先生在 1988 年已著文指出,深湾 C 层和 F 层出现盘状器、尖状砍砸器和楔形器在东湾 I 期已有类似的器形发现^⑪。

至于东湾 II 期,他以东湾③层下部、④层为准绳,认为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具有独特的风格,可命名为东湾文化^⑫,另一面又将这些陶器与英德青塘类型洞穴和潮安陈村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有着共同之处^⑬,其年代距今 5500 年前。

至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问题,邓聪先生将其称为大湾文化,他一方面同意秦氏的春坎湾期、深湾期的分期,一方面又将澳门、珠海、深圳、中山、东莞、增城乃至高要等地出土的同时期遗物归入大湾文化的范畴,并将之分为咸头岭、大黄沙、后沙湾、蚬壳洲、深湾等五组,即按这些遗物的特点和组合的特点,将大湾文化分为 5 个类型^⑭。

澳门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沙丘遗址不多,目前已发掘的只有位于路环岛东南部的黑沙湾遗址。港澳地区的考古学家认为,黑沙遗址亦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它有上下两个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黑沙 I 期,即黑沙下文化层与第 I 期即春坎湾期相当;黑沙 II 期,即黑沙上文化层相当于第 II 期即深湾期^⑮。

对香港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分期看法,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邓聪指出鲮鱼湾遗址可作为新石器晚期的代表,邹兴华把这一期归入珠江三角洲第 IV 期文化,约在公元前 2200—1500 年之间^⑯。

在七十年代,秦维廉先生著文提出深湾文化的概念,认为这种文化是从越南和平文化演变而来的^⑰。至于他又提出香港是属于“越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其中包括所有长江以南至越北的主要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⑱,更是一种概念模糊、混淆地域文化本身特征的说法。

更多的学者认为香港史前文化,既有本身的特点,也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属于同一文化圈,所以近

期的学者都将香港的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址联系起来研究,统称环珠江口史前文化。这个名词是商志禪于 1987 年首先提出,所指的环珠江口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两侧以及沿海岸附近的一些岛屿,这种说法已引起学者的重视和引用^⑲。当然它主要也受大陆母体文化的影响,如河姆渡、石峡、大溪、薛家岗等文化以及粤东、粤北、长江中下游以及台湾地区诸文化,其后更受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薰陶。由于香港处于南中国海地域,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在史前的遗址出现一些近似的石器、陶器是理所当然的。

近年来,有的学者也谈及香港史前文化的族属问题,普遍认为:它与岭南古越族有着渊源,也就是说香港是古越族繁衍生息的地方^⑳。秦维廉在 70 年代也认为在这一带活动的是古越族,但是到了 90 年代却著文否认具有自身特点的岭南古越族文化的存在,并力主远古以来香港居民是属于南岛语系^㉑。

(二)

既然香港、澳门在史前文化时期与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地,属于同一文化圈,那么有必要把港澳史前遗址的分期问题放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考察。

珠海的考古工作较细,史前文化的分期也较为详尽。朱非素先生认为,珠海新石器时代的沙丘遗址可分为五期,第 I 期以后沙湾⑥层为代表,第 II 期以草堂湾⑤、⑥层为代表,第 III 期以后沙湾②、④层为代表,第 IV 期以棱角咀③、④、草堂湾③、南沙湾②、③为代表,第 V 期以东澳湾③、④为代表,时间从距今 5000 年——3500 年^㉒。李子文先生的分期与之大同小异,将珠海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分为后沙湾遗存和东澳湾遗存二大段,在前者中包含两期:后沙湾 1 期和草堂湾 1 期;后者则包含四期:代表遗址有后沙湾二期、草堂湾二期、东澳湾遗址和亚婆湾第 2 组,时间约自距今 6000——3000 年。可以看出,与前一种意见相比,此分期只是在最后多出亚婆湾第 2 组,但亚婆湾第 2 组当已进入青铜时期;当然,分期的年代上限二者亦略有不同^㉓。

至于深圳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杨耀林先生分为两期,第 I 期代表遗址有大梅沙(I 区)、大黄沙、咸头岭、小梅沙;第 II 期代表遗址有赤湾,上洞、下洞、鹤地山下层、水沥封、内伶仃岛南湾,沙头村、灶下村和鹏咸 M4 等,时间从距今 6500 年至相当中

* 此项研究由“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

原商周时期^②。

从以上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关于在本地区的分期意见比较一致,但不同的地区在分期上却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地区在考古资料处理和研究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学者对整个环珠口地区史前沙丘遗址进行了综合分期,他们之间的见解也存在着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可分为六期,各期的代表性遗址分别为:第Ⅰ期,后沙湾⑥、小梅沙、春坎湾、黑沙湾;第Ⅱ期,草堂湾⑤、⑥、深湾F;第Ⅲ期,后沙湾②、④;第Ⅳ期,亚婆湾;第Ⅴ期,草堂湾③、东澳湾、南沙湾、鹤地山④;第Ⅵ期,鹤地山③、鸡山。其年代,第Ⅰ、Ⅱ期距今5500—4600,第Ⅲ至Ⅴ期距今4000—3000,第Ⅵ期进入西周时期。并认为第Ⅱ、Ⅲ期之间与第Ⅴ、Ⅵ期之间都存在较长的空白需要填补^③。

另一种意见分为四期:第Ⅰ期,后沙湾部分遗址为代表;第Ⅱ期,南沙湾部分为代表;第Ⅲ期,东澳湾遗址③、④层为代表;第Ⅳ期,以咸头岭M5、亚婆湾第一组部分陶器为代表^④。

这两种意见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基本的论据还是一致的。它们的分期基本上是以珠海市的发现为主干,然后将深圳、香港、澳门的有关遗址或文化层嵌入其内,这种作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尚待进一步的验证。

更多的学者是将珠江三角洲(含环珠江口)地区史前时期各类型的遗址放在一起进行分期讨论。严文明先生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暂可分为三期,代表性遗址为第Ⅰ期,有后沙湾一期、大黄沙、小梅沙;Ⅱ期,有水涌一期、草堂湾一期、南沙湾一期、后沙湾二期、灶岗、鱿鱼岗等^⑤。朱非素先生也分作三期,但各项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可能有感于各地遗址内涵不尽一致,于是将各期不同地方或不同类型遗址分开进行叙述。第Ⅰ期为距今5500—5000年的遗址,三角洲西北有蚬壳洲;东部有金兰寺等;南部有蚬岗、万福庵、大黄沙、咸头岭、龙穴、后沙湾一期(⑥层)等。第Ⅱ期距今约4900—4200年,三角洲前缘有草堂湾一期、大黄沙②层、深湾F层;三角洲北部有三水白泥银洲一期,河宕③层部分遗物,鱿鱼岗一期M31、M37。第Ⅲ期为距今4000—3500多年前,可分前、后段,前段贝丘遗址有河宕二期(③层)、灶岗、鱿鱼岗二期(②A、②B)、金兰寺中层、银洲二期,沙丘遗址有后沙湾二期(②、④层)、草

堂湾二期(③层),南沙湾②、③层、棱角咀③、④层;后段贝丘遗址有河宕三期(②层、晚期墓)、村头④、⑤层、银洲三期、茅岗、村头③层,沙丘遗址则有东澳湾、深湾C层等^⑥。我们认为,这种把每期遗址分地方或按不同类型进行论述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客观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存的复杂性。倘若把香港地区发现的数十处遗址也考虑进来的话,分期的难度可能就更大。

因此,有的学者则把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粗分为前后两期。

甄燕先生著文将这一带的沙丘遗址分为两期:第Ⅰ期,包括大黄沙、蟹地湾、春坎湾、深湾F层、东湾③层下部及④层,年代距今约5000—6000年。第Ⅱ期,含有深湾Cb层、东湾TB③上部,相当距今3000—5000年左右。^⑦吴曾德、叶杨先生认为这两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中期距今约5000年,晚期距今约5000—3500年,并认为,“限于目前的考古材料,如分得过细,可能将来会经不起检验”^⑧。其他如前述的邹兴华先生将之细分为四期,第Ⅰ期时间介乎公元前4500—3700年之间,第Ⅱ期时间介乎公元前3700—2900年,第Ⅲ期在公元前2900—2200年,第四期则处于前2200—1500年,各期的划分都获得了炭或炭化物C¹⁴测年数据的支持^⑨。不过,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所呈现的期别性或阶段性是否确实如此,尚待更深入和清晰的梳理。

(三)

不言而喻,上述各种分期意见的分歧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造成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遗址内涵较复杂。如上所述,这种复杂性可能首先表现为地域性。先莫论粤北、粤东、粤西与珠江三角洲的差异性,单就珠江三角洲(含环珠江口)地区而论,史前文化的地域性也很强。上述分期的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化内涵的地域性。就拿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早期普遍出现的、人们认为面貌一致的彩陶图案来说,不同地方所出也有相当差别。如有人把彩陶盘一项的纹饰进行分析,就发现存在67种花纹模式^⑩。暂不说这种分法是否准确,至少从中可窥见其复杂性之一斑。如果同时把沙丘、贝丘和岗地遗址放在一块讨论,就更不易进行详细的分期了。如从陶质上看,新石器时代中期本区贝丘、沙丘遗址均以夹砂陶为主,

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渐以泥质陶为主,而沙丘遗址却仍以夹砂陶为主;又如东莞的村头遗址的房基为地面建筑,高要的茅岗则为干栏建筑,这些情况肯定会给分期带来莫大的困惑。第二、供分期比较的资料尚待充实。首先是具有理想地层的遗址很有限,那怕如目前地层最丰富的大黄沙、后沙湾、东湾等遗址,能分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也就只有两层。其次,所出器物也相对不够丰富,器型简单,地域性又较强,给比较研究带来相当困难,实难以器物补地层之不足。第三,分期工作的深、广度尚不够。如前所述,不同类型遗址是存在一定差别的,这种差别要求我们应当做好各类型遗址本身的分期工作,如果跳过这一步去进行包含各种类型遗址的全面分期,恐怕会失去较坚实的基础。另外一点是,对沙丘遗址本身的分期,目前多是在现行行政区域“市”一级范围内进行得较深入,如深圳、珠海、香港都进行了各自的分期。但事实上,史前沙丘遗址的地域性分界并不一定与现行行政区域界线相合,或者应当说不可能完全相吻合,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打破省、市、地区界线,把本区史前沙丘遗址的分期真正建立在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外来文化对本区史前沙丘遗址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始于距今约6000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大溪文化曾对本区沙丘遗址造成深刻影响^⑪。后来又出现了“石峡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⑫。而由于本地文化相对较落后,外来文化的影响造成的冲击或震荡必定是很大的,再加上生态的影响,本地文化可能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乃至不连贯性,这一点远不同于北方。这也是我们分期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

总之,限于目前所占有的资料,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遗址进行大略而非详细的分期,是比较恰当的。

注释:

- ①Heanly, C. M and Shellshear, J. L. "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H. K. and New Territories" (P63—76), 1932.
- ②Finn, D. J,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1933—1936. Hong Kong University. 1958.
- ③Schofield Walter, The Proto-historic Site of the Hong Kong Culture at shek pek, Lautau, Hong Kong. 1938.
- ④、⑤在1971年秋至次年2月由白尔德医生、秦维廉传教士

主持的深湾遗址第一次发掘时仍采取水平层位发掘法。其后的第2至5次(1972年10月至1977年4月)才进行地层发掘法。见《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1978年。

- ⑥Meacham W; Note on the Middle Neolithic Sequence in the Light of Hac Sa. JHKA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XI, 1986.
- ⑦邹兴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 ⑧区家发、邓聪:《香港大屿山东湾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的发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⑨黄慰文等:《百色石器的时代问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⑩邓聪:《考古学与香港古代史重建》,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
- ⑪郑德坤、邓聪:《香港新发现的史前打制石器》,《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⑫见⑩。
- ⑬邓聪:《香港和澳门近十年来的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
- ⑭邓聪、黄韵璋:《大湾文化试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⑮Kelly, W; "Excavation at Hac Sa", JHKAS. Vol. IV, 1973.
- ⑯Meacham, W; "Hac Sa Wan, Macau" JHKAS, Vol, 1979.
- ⑰Meacham W; "Hac Sa Macau, Phase III", JHKAS. Vol XI, 1986
- ⑱Kelly, W, and Meacham. W;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Coloane, Macau, Asian Perspectives, 18/2. 1974.
- ⑲见⑦、⑬。
- ⑳原译为“货平文化”,今更正。
- ㉑见④第287页。
- ㉒见《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
- ㉓杨式挺、林再圆:《从中山龙穴及白水井发现的彩陶谈起》,《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㉔何清显、饶宗颐、区家发等,见《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 ㉕秦维廉:《古越族的人类学定义是否成立?》,《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 ㉖又《论“百越”定义》,“印度太平洋史前学会第十五次大会”论文,1994年。
- ㉗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 ㉘李子文:《珠海史前文化序列初论》,《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下转第41页)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 之现状及趋势分析

陈丽君

“文化”一词有多重含义，此文所指主要包括道德风尚、企业文化、科教文卫、生活方式等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近十多年其经济飞速发展与香港关系密切，其文化的发展同样与香港密不可分。探讨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近十年香港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传播的背景及初期表现

本来，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文化处于同一体系中，即都为岭南文化。那时，内地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大于香港文化对内地的影响。而在清朝末年，香港早期文化曾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一个因素。民国时期，内地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都对香港文化的形成有着强烈影响。香港文化的根在珠江三角洲。五十年代，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开始疏远并逐渐隔离，从而文化上也逐渐隔离。以后的三十年中，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文化各成体系分别发展。

1978年，深圳、珠海以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内地对外开放的前沿与先行地区。历史上、亲缘上与珠江三角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同胞如潮水般涌入珠江三角洲。据香港统计，1978年前往内地的香港居民为130万人次。^①港人的涌入，带来了香港形形色色的观念与文化。透过港人带来的信息，珠江三角洲人发现自己以外的世界原来是非常“精彩”的。于是他们抱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希望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过探亲访友以及收看香港电视、书刊、录音录相带等传媒，香港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其中健康的和腐朽的一齐涌入珠江三角洲，令珠江三角洲人目不

暇接、眼花缭乱。他们既无法辨别也无暇辨别和选择，便开始大量吸收，好坏兼容并蓄。于是商品、市场经济观念及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强烈地撞击着产品、计划经济观念与管理文化，多彩的好坏并蓄的生活方式则猛烈地冲击着单一、贫乏的生活方式。这便引起了该地区文化领域的裂变。形成了此时期特有的因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而引起的思想、文化的彷徨与混乱。在彷徨与混乱中，香港文化的精华还来不及吸收、借鉴，而腐朽没落的东西已大行其道。

这个时期，香港文化的涌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一方面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条件，另一方面又因其负面影响而引起人们的忧虑。

二、香港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传播的现状

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关系进一步密切。据广东统计，1985年入境港澳同胞已达1603.37万人次，比1978年增长了10倍多，1992年更达2855.3万人次。1983年试办“香港游”，1985年参加港澳游的广东居民为6.44万人次，1992年已达37.23万人次，其中多为珠江三角洲居民。^②至于珠港的经济联系已是不可分离。80年代以来，香港80%制造业厂家将生产工序主要移到珠江三角洲。1992年底向广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三资企业为26365家，其中大部分是在珠江三角洲的港资企业。与此相应，到香港投资的珠江三角洲企业也不断增加。1993年内地对港投资已达120亿美元，珠江三角洲占相当比重。^③与此相适应，香港传媒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已极为普及，珠江三角洲人收看香港电视的比率高达70%以上，此

促使香港文化深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但珠江三角洲文化也对香港产生反作用。

以上原因使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一方面是大大加强，另方面是产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影响的加强主要表现为影响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质的变化主要是珠江三角洲人已从对香港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文化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对香港文化进行分析辨别，并有选择地进行吸收、借鉴，从而使香港文化的影响朝着更有利于内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发展。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最大也是最有利的是香港企业文化的影响。北移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制造业企业带入了港人典型的商品、市场经济观念及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及信息、信誉、质量等观念。在这些观念冲击下，珠江三角洲人在经历过彷徨之后，接受了这些观念，在内地率先摆脱产品、计划经济观念。在新观念指导下，珠江三角洲人建立起了一批乡镇企业及个体企业，并使这些企业经受住了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考验，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支柱，推动着这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珠江三角洲人观念的更新还带动了整个内地人观念的更新，对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有积极意义。

香港文化其次的有利影响是港人法治精神的影响。香港经济高速发展，原因之一是港府不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而是通过日益系统化的经济法对经济进行间接干预，即将港人的经济活动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比较有效地避免了市场经济的某些破坏性，使市场机制有效地调节经济。港府形成政策有意识地通过法律间接干预经济是1977年开始的。而香港的许多经济法规实行了数十年甚至百多年，因此港人早已养成了从事经营活动要遵守法例的习惯。用法律来约束自己，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已成为香港人的处世方式。此法治精神，珠江三角洲人在同港商合作办厂、合作贸易时便可以感受到。在香港社会及港人影响下，珠江三角洲人自然产生了加强经济立法的紧迫感。珠江三角洲人便通过吸取香港经济法中的精华制定适应本地的经济法规及移植香港的某些法例等开展这一工作。在港人法治精神的影响及香港经济法规的启发作用下，珠江三角洲经济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第三个有利影响是科教文卫方面的经验及成果的影响。香港在教育及卫生方面都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教育方面，特别重视根据社会、经济需要办学，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及继续教育。此教育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卫生方面，香港城市环境清洁且井然有序。香港的这些好经验、好成果通过近年相互交往的加强早已为珠江三角洲决策层所了解和熟知，因而不乏经验已融入珠江三角洲市县实施的政策或已成为实际行动。所以近年珠江三角洲人也特别重视根据社会、经济需要办学，及重视在职培训与继续教育，不少市办起了大学，并与广州的高校合作举办各类在职培训班和成人教育课程。卫生方面也借鉴了香港的某些有效形式加强城市环卫管理。这些借鉴，对珠江三角洲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第四个有利影响是较为良好的社会公德，以及遵守公共秩序的社会风尚等等。这对珠江三角洲社会公德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改善有积极意义。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第五个有利影响是生活方式中健康方面的影响，即语言、行为及衣食住行娱乐方面健康因素的影响。随着近年珠江三角洲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必然。受香港人及香港各类传媒强力文化辐射影响，珠江三角洲人自然潜移默化地被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这些影响，在三方面产生了较好效果。一是提高了珠江三角洲人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香港人因较早达到了较高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先进的吃穿住行生活方式及较文明的语言行为。在其影响下的珠江三角洲人生活方式自然可以较快提高文明程度。二是对于珠江三角洲人生活方式从单一、简单化向着丰富多采化方向发展具有较大作用。三是对刺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生活方式以消费文化为主，而生产与消费相辅相成，所以追赶港人生活方式对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的第六个有利方面是对于岭南文化的重新统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被隔离了三十多年的粤港文化，现正通过相互渗透而朝着重新统一的方向发展。

珠江三角洲人对香港文化由盲目追求的狂热转向冷静分析和有选择地吸收后,香港文化的影响负面、弊端正逐步减少。现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黄、赌、毒、黑”腐朽现象的影响。其中尤以黄和黑较为突出。黄色文化在内地的死灰复燃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香港影响是其中之一。而黑社会则是近年对珠江三角洲影响较大的。在香港,参加帮派者有 10 万之众。据香港警方研究黑社会的报告,黑社会的第一代已晋身上流社会,甚至广泛地进入内地南方各省经商。报告透露香港现有黑社会组织共 57 个,这些黑社会组织逐渐渗入南中国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个别黑社会堂口及黑人物利用在香港赚来的钱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区投资开设娱乐场所。部分黑人物则表面上做生意,暗地里与当地犯罪分子勾结,从事非法活动。^④香港黑社会的渗入对珠江三角洲社会治安造成较大危害。

二是香港迷信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香港迷信文化是较为盛行的,如相信风水、相信神灵等。迷信活动在内地死灰复燃,也有其内在根源,而香港的影响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三是香港庸俗、低级文化的影响。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香港文化市场中,有大量迎合低级趣味的质量低劣的影视作品、流行歌曲。这些低级庸俗的作品对人的精神往往有麻痹作用,使人消沉、萎靡不振。此类低级庸俗的文化通过香港传媒大量涌入珠江三角洲,对珠江三角洲人尤其是青少年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对于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夸大,也不能低估,应作恰当的分析。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精神条件主要是正确的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努力,而香港先进文化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珠江三角洲的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持续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产品、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与文化震荡,即内部因素是主要的,而香港的不良影响则是外部因素。

三、展望“九七”后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

“九七”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将属同一国度,

只是制度不同而已,关系无疑将更密切。由此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将出现一些较明显的变化,预计主要会出现以下四大趋势:

一是由于香港文化更易进入,两地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两地人员往来更频密,将使香港文化的影响更大。一方面香港的企业文化、法治精神、科教文卫成果与经验、良好的社会公德以及生活方式中的健康因素将对珠江三角洲文化建设起到日益显著的推进作用,另方面香港黑社会、“黄赌毒”腐朽文化、封建迷信文化、庸俗低级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渗透也会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九七”后香港黑社会组织将难以再以香港为大本营,它们中已有不少现在就将据点移向海外,其中不少在向美国发展。而中国内地因背景、文化、生活习惯、语言与香港一致,自然成为香港黑社会发展选择的地区之一,其中南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更成为较重要地区。^⑤

二是两地文化关系将由现在的主要为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单向影响转向两地文化双向影响。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了,这将促使香港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政策密切关注,因此看国内报刊、电视,收听国内电台都将更为普遍,而首先则是看珠江三角洲的报刊、电视;同时又由于两地各领域交往合作的加强,因而珠江三角洲的科技、教育、卫生、文艺成果与经验会在香港产生一定影响,珠江三角洲人所保持下来的尊老爱幼、勤劳勇敢等中国传统美德也会影响香港人。同时,珠江三角洲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而珠江三角洲对香港的这些影响又可能很快反馈到珠江三角洲,给珠江三角洲文化建设带来复杂的效应。

三是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的利大于弊的趋势将可能进一步明显,主要取决于珠江三角洲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努力程度。如在吸收、借鉴香港文化精华及抵制香港腐朽文化方面加强工作,便会朝正面方向发展,否则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

四是由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相互影响的加强,岭南文化将加速统一。重新统一的岭南文化将融合香港文化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各自特点,形成崭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

四、利用和借鉴香港文化的精华,

推动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的发展

目前香港文化影响的利大于弊是珠江三角洲人主观认识水平的提高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而取得的。而“九七”后珠江三角洲政府和人民应进一步吸取香港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

一是要进一步吸收和借鉴香港的企业文化。珠江三角洲人要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其“开拓”、“竞争”、“信息”、“质量”意识。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一方面可以派人到香港学习企业管理艺术,另方面可请香港方面的专家到企业讲学,更多地聘请香港专业人士到企业任职。

二是要充分吸收和借鉴香港法制文化中的精华,尤其是廉政法与经济法中的精华。香港廉政是较有成效的,原因之一是其有较完善的廉政法规体系,主要有《防止贪污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及《1981 年接受利益(总督许可)公告》。这些法规中许多内容很值得我们借鉴,如《防止贿赂条例》中的“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即构成犯罪的条款便很有借鉴意义。香港经济法规中值得借鉴的内容更多,如金融方面的、贸易方面的、工业方面的法规都有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珠江三角洲要更多地吸引外资,就要在完善经济法规中做出努力,借鉴香港是一快捷有效的途径。

三是要加强吸收和借鉴香港科教文卫方面的成果和经验。这方面的工作虽已开展起来了,但明显很不够。香港在教育与城市环境卫生方面的经验不少,珠江三角洲要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应当多吸收借鉴香港的经验。如应当借鉴香港的以高薪吸引及稳定优秀教师、严格挑选任用教师、将教育程度与薪金挂钩以鼓励学生升学,高校多开办函授、电视教学等遥距课程以鼓励在职人士继续深造等经验。城市环卫方面可借鉴香港严格执法及培养市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有效措施。

四是积极拓展与香港科教文卫的合作,以达到取长补短,推动珠港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如广州的暨南大学招收香港学生,香港的各间大学都招收广州等地的研究生,

文艺方面的合作则更多。但合作明显是不够的,应当加深与扩宽彼此的合作。教育上可以互派教师讲学,互招学生及合作办学。这将更利于发挥各自所长,加快双方人才的培养。科技方面可发展为合作进行高科技研究及开发。卫生方面也可合作攻克医学难题。要提高合作的层次,现关键的是要将民间性质的合作提高到官方合作层面。

五是应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大力宣传港人良好的社会公德及生活方式中的健康方面,以利于珠江三角洲人吸收和借鉴香港文化中的健康方面。同时,指出其消极方面。

六是引进香港的健康图书资料,并多出版些系统介绍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书籍,以便人们全面地了解香港,避免片面性,从而利于人们正确地评价、对待香港和正确地学习和借鉴香港文化。

七是鼓励引进香港的健康娱乐方式,抵制消极的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在仿效时要结合内地情况,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可为我所用的东西。

八是坚决抵制香港腐朽和消极文化的渗入及影响。首先应严厉打击渗入珠江三角洲的黑社会组织及人物,绝不能让其呈蔓延趋势。对于迷信文化,则应采用生动、有效形式大力宣传科学,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抵制香港的庸俗低级文化的最好方法则是鼓励珠江三角洲的文艺工作者多创作些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政府与有关部门多设立些健康的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电视台、音像制品公司不应只从纯市场角度而不顾社会效益,要多制作和播放健康的节目。

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问题是很复杂的,本文的探讨很粗浅,只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周维平:《迈向 21 世纪的粤港澳经济关系》,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1993 年 11 月。

④《香港第一代黑人物已晋身上流社会》,《黑势力渗入内地华南地区》,《港澳参考》,1994 年第 10 期。

⑤《九七年前香港黑帮转移阵地》,《港澳参考》,1994 年第 16 期。

〔责任编辑:许锡挥〕

简评《澳门地理》

司徒尚纪

澳门虽为珠江口外一个弹丸之地，但却是个举世闻名的地方，故澳门地理研究工作，不绝如缕。除大量有关论文以外，鸿篇巨制者，以本世纪四十年代缪鸿基、何大章教授合撰《澳门地理》为嚆矢。该书第一次用近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澳门自然和人文地理众多方面，获得时人很高评价。四十多年以后，鉴于形势改变，该书由作者重新撰写，易名为《澳门》刊行于世，不过已成为一部以地理为主的综合性著作了。晚近出版的关于澳门的地理专著，尚有彭琪瑞、薛凤旋、苏泽霖《香港与澳门》、刘南威等《澳门自然地理》、吴郁文等《香港、澳门地区经济地理》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重塑了澳门地理某个侧面，展示了澳门地理的风景区，在澳门地理这个领域里占有自己的位置，也为当代港澳研究增添异彩。

最近，澳门地理研究又获新成果，即黄就顺、邓汉增、黄均荣、郑天祥先生合撰《澳门地理》一书出版发行。该著较之已有同类著作，颇具特色，值得重视。计有数端：

第一、突出重点，超越寻常。澳门由于范围狭小，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区域研究已达既深又广程度，要有所新建树，实不容易。本书却独辟蹊径，摆脱区域地理通常采用的面面俱到的架构体系，不是罗列所有的地理要素，而是有重点地选择、突出那些对澳门有特殊意义的地理因子，分章节阐述其特点与时空分布规律，取得良好效果。例如，言澳门地质地形，指出其受“多”字型构造控制，为花岗岩等多种地层覆盖，在内外营力作用下呈现丘陵、台地等多种地形；言水文，突出其受海河交汇作用

的影响，在潮汐类型、潮差、潮流方面表现的特点与规律，特别指出泥沙大量沉积对澳门航运和贸易的影响；言气候，分列“季风气候”、“气温与湿度”、“云量、日照与太阳辐射”、“降水”、“台风”等章节，阐述澳门气候各因子与过程的地域特征、时空分布、区际差异等，将澳门气候特点和盘托出。对每个自然地理要素的介绍，均以定性定量为据，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详略得当，读后给人以强烈深刻印象。例如对澳门社会经济影响甚大的台风，则以较长篇幅，说明其级别、登陆次数、季节及年际变化、路径与危害等等。

澳门在人文地理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本书也善于取舍，巧妙安排，紧紧围绕澳门地狭人稠、资源匮乏、人类活动对环境压力巨大这个总体特征展开论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介绍澳门土地利用的结构、类型、城市功能分区、内外交通布局等，皆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充分显示澳门这座“寸土寸金”港市的人文景观特色。

人类活动必然影响环境。该著设“环境污染及对策”专章，详细介绍澳门在空气、水体、噪音、垃圾等方面被污染或作为污染源的状况及前因后果，提出从立法、监测、管理、规划到宣传教育等一系列对策与措施，而这又与上述澳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论述上前后呼应，章法严谨，同时收到强化重点的效果。

另外，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中心之一，在我国文化地理上居特殊地位。但文化含义很广泛，如何表达澳门文化地理特色，却是个棘手问题。本书则在澳门众多文化景观中选择民俗一项为代表，

专章阐述包括岁时节令、婚丧、衣食住行等方面所体现的澳门文化特质，既有岭南文化、中华大文化强大基因和深厚根底，又积淀、覆盖很厚的西洋文化层，构成一幅澳门文化风景线。民俗是文化涵盖面中最为稳定和最具传承性的一部分，是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该书以此为重点给予介绍，也是该著的长处之一。

最后，该著之所以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正确地处理好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为此而设置的专章，客观地、辩证地分析、评价澳门地理区位、自然条件与资源的优势与劣势，不是囿于地理环境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也同时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例如多次填海拓地对澳门发展的意义，人类活动引起景观变迁，以及环境污染等。人们可以看到，辩证法在自然与社会发展和研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在地理学发展史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倾向，要么过份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即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地理环境的作用，倡导地理虚无主义。这两者皆不可取。本书在这个问题上深得辩证法要领，摆好两者关系，在同类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也为同类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第二，经纬结合，深入实质。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地理景观，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变或是人类世代劳动积累的结果。现代地理景观是一个很薄的、稍纵即逝的层面，明天将成为历史。所以在地理研究上经常采用地理演进方法，即追溯地理现象产生、发展历史过程，以加深对它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种以时间为经，地理要素为纬的研究架构和方法，在本著中得到充分运用。细检全书，不难发现，举凡澳门名称由来、地质构造活动引起地震、山丘侵蚀、沙堤港口堆积淤塞、海岸线迁移、天气异常、台风活动和灾害等自然地理现象，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城市功能分区和布局转移，各类基础设施，特别是水陆交通发展，民情风俗更替等人文地理现象，都无不尽可能使用已有资料，交代它们历史过程和现状特点，从而在纵向上提供了各种地理现象的时代剖面，有助于人们理解澳门地理的本质所在。

例如，作者复原的澳门海岸线，就有 1794 年、1912 年、1924 年、1938 年和今年海岸线位置，这对认识澳门作为一个港口的历史变迁，规划今后发展方向和布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又如城区演变，作者也备述其详，从早期局限在澳门半岛南部，鸦片战争后向北拓展，包括了多次填海工程和扩大陆地，渐渐发展为今日澳门城区。城市建筑也从过去茅蓬棚舍、砖木房屋到现代高楼大厦，无不展示澳门城市性质、功能、结构和景观的嬗变，这对城市规划都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图文并茂，恰到好处。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也是一种有效的地理研究工具和表达手段。在该著中，文字分析说明与地图是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共同达到表达之目的。据统计，穿插全书有地图和各类统计图 35 幅，还有不少表格。这些图表不仅精确清晰，而且繁简得体，设计合理，一目了然，起到文字说明代替不了的作用。例如 1794—1938 年几幅海岸线变迁图，以及路环岛、凼仔岛古今海岸变迁图，其界线清楚醒目，对比强烈，近 150 年沧海桑田，尽囊括其中。

第四，实地调查，材料翔实。本书作者，或长于澳门，或长期工作于斯，或对澳门作过多次实地考察，故所撰述，除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献、政府公报、统计年鉴，吸收其他有关研究成果以外，很多还是亲自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故翔实可信，不仅有助于使该书获得较高学术水平，也增加了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区域地理被视为地理研究的高峰，一切地理研究都应归结于区域，归结于生产。但近年来，区域地理得不到应有重视，甚至放弃了这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作为区域地理研究成果，更为难能可贵。恰如何大章先生为之作序所评价的“诚为优秀之作”也。加上它一流装帧和精美印刷，在同类作品中堪为翘楚。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将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在认识澳门和建设澳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肖贤彬〕

香港经济简讯

蔡婉华

香港竞争力居世界第四位

国际管理发展学会 (IMD) 最近发表“1994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首次公布全球竞争力最强劲的头 41 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美国重踞榜首，新加坡第二，日本第三，香港第四。亚洲四小龙全部在排行的 25 名之内，即余下的台湾为第十八名，韩国为第廿四名。而未入四小龙的马来西亚成绩骄人，排行第十七，已在台湾、韩国之上。

香港的竞争力优势中最突出的是“本地经济力量”、“国际化”（即参与国际贸易及国际资金流通的程度）、“政府”（政府政策有利竞争的程度）及“金融”。但人才外流现象仍将继续，对教育及改善市民生活水平的投资有待增加，面积小资源少的限制，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服务业成为香港经济主导

港府在最新劳动人口预测中指出，由 1991 年至 2001 年，每年制造业人口将下降 4.5%，制造业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将由 1991 年的 24.5% 降至 2001 年的 13.7%。在服务业工作的劳动人口增幅最快，预计未来每年增幅平均是 30%，其中增长最大的工作人口是出入口贸易，将占服务业人口 35%；其次便是个人服务；而商业和金融界的工作人口增幅属中等，建筑业人口受基建工程及新机场工程影响。从职业分类看商务专业人士增幅最多。而橡胶制成品操作员人口跌幅则最大。

香港旅游业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略好

今年上半年各地来港旅客 439.6 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3.9%，总收益 302 亿，较去年同期增加 2 亿元，增幅不足 1%。游客市场中台湾是最大的游客市场，日本第二，中国游客上半年在港消费位列第三；东南亚市场的来港人次和消费均轻微下跌；西欧地区为香港另一个呈现增长的主要旅游市场，反映了当地经济复苏。各项游客消费项目所占百分率大致稳定，购物仍高居首位。

香港将连续三年保持全球最大货柜港

香港今年可望连续三年保持全球最大的货箱港的地位。今年上半年，香港港口的标准货柜吞吐总量为 511 万个，比一年前的 417 万个增加 22.6%；而新加坡同期的吞吐总量为 490 万个标准箱，比去年同期增逾 16%，上半年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总量比新加坡多出 21 万个。这使香港和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冠军和亚军货柜港的地位。

香港机场新财务安排协议签订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九时半在香港坚尼地道旧英童学校举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机场委员会会议，根据《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签署新机场及机铁总体财务安排会议纪要。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及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在文本上签字并互换文本。纪要内容主要有六点：1. 注资与债务安排；2. 新机场和机场铁路用地；3. 工程进度和成本监督和控制；4. 工程合约索赔；5. 工程进度和财务安排的检讨；6. 港英政府与机场管理局及地铁公司签订的具体协议。

恒生指数成分股大改组

今年 3 月以来，怡置系五间公司（包括怡和控股、怡和策略、置地、牛奶和文华东方）决定在明年一月及三月取消在本港的第二上市地位，恒生指数服务公司另选出五间公司以取代怡置系五间公司成分股位置；同时还剔除了南联实业及丽新国际成份股位置。淘大置业、粤海投资、德昌电机、东方报业、香格里拉、信和置业及南华早报等七间公司成为恒指成分股新贵。

该七间公司的市值共为 840 多亿元，而原来七间成份股的市值则有 1600 亿元，即少了 700 多亿元，但日后恒生指数 33 只成分股，仍占本港股市市值约七成，仍可反映本港股市走势。

今年以来港股下跌的情况及前景

今年以来，港股波动剧烈，股价基本上反复下跌，成交渐趋萎缩。今年 1 月 4 日恒指收市价 12201.09 点，创历史最高记录，使“摩根士丹利气泡”膨胀到极点；4 月 4 日恒指收市报 8369.44 点，造出今年以来（至 11 月 24 日）最低纪录，较今年收市的高点回落 3831.65 点，下跌 31.4%，其后虽有回升，但始终受制于 9700 点关口。到了 8 月底，受美国股市造好、美盘涌现的刺激，恒指才升至 9.929 点，较今年以来收市的低点上升 18.6%。上半年每月成交金额也基本逐月减少：1 月 2152 亿元，6 月 613 亿元，8 月 871 亿。

股市下挫的原因是：1. 外资饱食远离，使港股受挫下滑；2. 美国利息回升使资金流向发生变化；3. 今年 3 月底，港府采取平抑楼价措施，使正在急升的楼市冷却，致使第二季度恒指地产分类指数下跌 15.3%，同期恒指下跌 3%；4. 中国内地一些不明朗因素的困扰。估计年底前，港股仍将反复，大部分时间会徘徊在 8500—10000 点之间，且中英关系是恒指重要影响因素。

四大实力红筹股

香港证券界人士普遍看好红筹股的未来走势，在众多的红筹股中特别看好几只有实力的红筹股，它们分别是：

中信泰富：市值已达 460 多亿港元，每年盈利增长十分迅速，1992 年纯利增幅为 212%，1993 年为 81%，今年上半年增幅达 46%。近期在港的几个大型投资项目，预计在未来数年也将带来巨大的效益。

粤海投资：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迅速，粤海投资的业务发展受益非浅。至 1993 年，粤海投资的资产净值已由 1989 年的 2.37 亿港元迅速增至 23.9 亿港元，5 年间增幅 10 倍以上；1993 年纯利润 3.3 亿港元。

中旅国际投资：中旅国际投资是中旅集团属下的一个公司，预计今后母公司会将在内地的许多业务注入中旅国际投资，使股价上升具有大的潜力。

华润创业：资产总额达 28 亿港元，业务多元化，估计未来母公司华润集团将向华润创业注入更多优质资产，故普遍看好华润创业前景。

香港市场上中药材价格一跌再跌，幅度惊人。

港澳地区是中药材主要出口市场，约占中国的总出口值的七成左右。1989 年以来，由于生产经营的混乱，使得中药材在港澳的出口、转口市场上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饱和状态，出口价格一跌再跌。1989 年中药材出口 2.53 万吨，比 1979 年的 9016 吨增加 1.8 倍，而出口金额却仅与 1979 年的 1.63 亿美元相近。如当归 1979 年出口价 11 万港元/吨，现在却是近 2 万港元/吨，不足 1979 年的二成，接近香港青菜价格；人参十年前出口价平均 30 万港元/吨，现在不足 6 万港元/吨；杞子十年前平均 15 万港元/吨，现在最多只卖 3 万港元/吨；杜仲十年前 50 万港元/吨，现在不足 15 万港元/吨，黄芪十年前平均卖 20 万港元/吨，现在只卖 2.4 万港元/吨；贝母十年前平均 100 万港元/吨，现在不到 30 万港元/吨。这些主要的中药材出口数量成倍增长，出口价格一跌再跌，只有十年前的 3 成左右，而香港通胀十年来就达 120% 左右，加上币值贬低，可知损失甚大。

〔责任编辑：肖贤彬〕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创设、职能及其运作

常慧君 编译 陆军 审校

香港金融管理局 (HongKong Monetary Authority) 始建于 1993 年 4 月 1 日, 旨在确保九七过渡和提高港人信心, 实现政府在金融和银行领域中高度专业化和连续地履行其职责。

1. 金融管理局创设的背景

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要性的加强, 要求有一个官方的实体来协调运作, 以促进香港货币稳定、金融体系有效整合和金融设施健康发展。金融管理局即是为这一要求应运而生, 其产生的背景可以简述如下:

——金融稳定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至为重要, 过渡时期如此, 九七之后亦复如此。

——《中英联合声明》中明文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

——香港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 金融部门对于本土生产总值 (GDP) 的贡献越来越大, 管理金融和银行业所牵涉的利益关系越来越扩大, 且呈上升趋势。

——目前, 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正处于一场革命, 但风险管理却远远滞后于金融创新和设计。

——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明确而又正确, 但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随着中港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香港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更难以预料。

——未来几年中, 中国的金融和银行体制将可

能发生重大变化, 这将对香港造成巨大冲击, 香港应密切关注其可能的动态, 并且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适当反映, 以维护香港的金融体系。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量大, 且其变化反复无常, 即期和远期的利率、汇率波动增加了货币和金融管理的复杂性。

——近几年来香港及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香港市场实际利率呈负数, 资产价格上扬, 这将对银行造成压力, 资本的可供性可能逆向发展。

2. 金融管理局的职能

金融管理局的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联系汇率制度框架内, 通过外汇基金管理、货币政策运作和其他适当方式维持货币的稳定。

——加强对银行业及其接受存款业务的管理, 强化对认可机构的监管, 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一体化程度和发展水平, 特别是支付和清算安排。

上述职能与全球其他中央银行职能并无二致, 不过, 金融管理局并不履行如下职能:

——发行钞票。原来香港发钞银行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两家, 1994 年 5 月, 中国银行开始参与发行钞票, 这些发钞银行要求持有金融管理局为外汇基金而发行的不带息一年期公债。

——清算行活动。这些活动由香港银行公会 (HKAB) 的清算行进行。

——政府的银行。尽管外汇基金持有政府大部分财政储备, 但金融管理局并不作为政府的银行。

3. 金融管理局的运作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而言, 在上述背景下履行其职能, 确实存在许多困难。为迎接此种挑战, 金融管理局奉行如下经营宗旨。

——公开、公平, 高透明度。

金融管理局在货币市场上公开运作, 并定期在市场屏幕上加以告示, 组织新闻界、利益各方、国际专家和立法局等进行公开讨论, 行将创设一份季报, 预计在 1994 年年底首发。金融管理局的许多活动是经过广泛磋商后进行的, 如向香港银行公会及其他一些专业团体等咨询。

——避免过度管制

金融管理局将致力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避免给私人部门增加负担, 以发挥其主动性、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此外, 金融管理局保证在既有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内, 严格控制滥施职权及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声誉的行为。

——创新和专业化, 依据最高国际标准行事。

为与国际主要金融市场运作效率和发展状况相匹配, 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必须发展其金融设施, 如清算和结算制度。此外, 香港应为投资者和发行者提供广泛的金融工具, 以利于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经营资源和管理风险。金融管理局将与银行业合作保证香港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香港金融体系和外汇基金守护神的有效组织, 金融管理局将帮助促进其职员在专业和道德方

面的培训及人力资源开发, 鼓励在总体上实行银行业的高标准。

——责任范围

金融管理局对财政司负责, 依据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 (EFAC) 的指导管理外汇基金。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为财政司提供咨询, 其成员由港督任命, 包括银行界的要员、会计和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 他们每个月会晤一次, 以就金融管理局的运作状况提出意见。金融管理局根据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订的方针, 从事外汇基金投资, 并就金融管理局的年度预算向财政司提出建议。实际上, 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酷似金融管理局董事会。此外, 金融管理局帐户应由长驻金融管理局的审计人士进行连续严格审核, 并向立法局提交年度报告。

——国际方面

为提高香港 1997 年前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管理局作为负有香港中央银行职责的机构, 目前正致力于加强与其他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业的联系, 其目标主要表现为:

(1) 强化储备管理,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走势;

(2) 基于香港自由、开放的市场结构, 增强与主要中央银行和多边组织的联系, 以便于有效地进行金融管理;

(3) 加强与国际银行业监管员的联系, 以巩固香港作为一个拥有良好监管制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通过国际联系和合作, 改善金融管理局内部研究、政策制订和履行能力, 增进意见和技能的交流, 以保证香港处于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前沿。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 1993 年年报英文版编译)

〔责任编辑: 李晟〕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成果汇编 (79~93 年)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时间
1	香港海员大罢工	章洪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
2	现代香港经济	郑德良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
3	香港经济问题初探	郑德良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9 月
4	《明史·佛郎机传》笺正	戴裔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5	香港经济考察	中山大学经济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
6	澳门	缪鸿基 何大章 雷强 郑天祥 黄就顺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5 月
7	香港经济成长特征	郑德良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7 月
8	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关系的研究	雷强 郑天祥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7 月
9	香港高等教育	雷强 吴福光 钟光 郑天祥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8 月
10	香港经济	郑德良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1	香港方言与普通话	李新魁	中华书局 1988 年 12 月
12	香港经济教程	甘长求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4 月
13	香港人学汉字	曾宪通 张桂光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9 年
14	香港作家传略	王剑丛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
15	香港经济发展与文化	郑德良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7 月
16	香港对外贸易	甘长求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
17	香港澳门地区经济地理	郑天祥	新华出版社 1990 年
18	香港法自学指南	曾穗生 李后霖	广东省司法厅教育处 1991 年 1 月
19	香港行政管理	夏书章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 2 月
20	香港法教程	李启欣 主 编 程信和 副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5 月
21	以穗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	郑天祥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1 年 6 月
22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邓开颂 黄启臣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
23	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	王剑丛 汪景寿等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24	港台思想与大学生	张孝宜 副主编	鹭江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25	港台思想对青年影响研究	张孝宜 副主编	鹭江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26	港台思想对青年影响调查报告选编	张孝宜 副主编	鹭江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27	港澳论丛 (一)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28	中国城镇发展研究	郑天祥 (合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年 7 月
29	香港奇迹——经济成就的文化动力	郑德良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7 月
30	香港房地产的发展与管理	甘长求	中华书局 (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社 1992 年 8 月
31	港澳教育评析	吴福光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8 月
32	香港社会问题研究	何肇发 丘海雄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9 月
33	香港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	林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5 月
34	香港房地产业	甘长求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35	澳门地理	郑天祥 (合著)	澳门基金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1993 年 10 月
36	香港产业结构论	林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说明：本期仅选登成果汇编的专著部分，以后将逐期分类刊登论文及译文部分。

港澳研究资料中心供稿

征 订 单

《当代港澳》是一份融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发行，由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办。《当代港澳》是国内港澳研究具有权威性的杂志之一。她的研究领域包括港澳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以及粤港澳关系，杂志设有多个栏目，文字严谨、形式新颖、格调清新。

《当代港澳》是一个开放的园地——她欢迎各地作者的学术稿件，也欢迎外向型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介绍和刊登广告（广告收费标准附后），欢迎来人来函索取专题资料和咨询。

本杂志暂为半年刊，大 16 开，每期 64 页（创刊号为 80 页），人民币 5 元（含邮费）。此次征订 1995 年一、二期（共二期）共 10 元整。另外，我编辑部尚有少量 1993 年 12 月创刊号及 1994 年一、二期（共三期），共 15 元整，如有需要者，可一并办理。我刊开户银行：广州中山大学工商行新港西办事处，账号：89—03—04878（请务必注明订购《当代港澳》杂志）；汇款请寄：广州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当代港澳》编辑部；本刊地址：中山大学校内，邮政编码：510275；电话：4446300~6799；联系人：李静萍。

《当代港澳》编辑部

附：《当代港澳》杂志刊登广告收费标准

封面（彩色、4/5 版）	8000 元
封底（彩色、整版）	6000 元
封二、封三（彩色、整版）	各 5000 元
内页（整版）	1500 元
内页（半版）	800 元

注：封面只刊登公关广告，恕不刊登商品广告。

订阅《当代港澳》杂志报销凭证

199 年 月 日		第一联：订阅单位存查	
订阅单位名称		收款单位：广州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当代港澳》编辑部	
订阅份数	95 年全年 份 每份单价 10 元	开户银行：广州中山大学工商行新港西办事处	
	创刊号及 94 年全年 份 每份单价 15 元	帐号：89—03—04878	
总金额（大写）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订阅《当代港澳》杂志	
币 佰 拾 元 整			

说明：此联与银行汇款或邮局汇款回单一并作报销凭证，没有银行或邮局汇款回单不得报销。如需正式发票者，请来信说明。

《当代港澳》杂志订单回执

199 年 月 日		第二联：发行存根	
订阅单位名称（全称）	邮政编码及详细地址		
订阅份数	95 年全年 份 第份单价 10 元		
	创刊号及 94 年全年 份 每份单价 15 元		
总金额（大写）	币 佰 拾 元 整		

说明：此联请寄回本刊，以作发行凭证及存根

本刊启事

本刊自创刊以来,承蒙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对此,编辑部全体同仁深表谢忱。由于来稿增多,现将有关文稿写作的技术性要求作如下补充声明:

- 一、来稿字数限于 8000 字内。
- 二、研究论文及调查报告来稿请随文附寄 150 字左右摘要一篇,否则,由编辑部指定有关人员撰写文摘,文摘写作报酬从稿费中扣除。
- 三、来稿务必字迹(包括标点符号)工整清晰,用字规范化,引文务必核对准确,一律采用篇末注。

封二、封底照片说明:

1. 与高主赐律师商谈合作计划。右一为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许锡挥教授,左一为中心副主任郑佩玉教授。
 2. 与香港资深教育界人士杨乃舜先生坦诚交谈。
 3. 访问中国银行。右二为该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总经理王昌耀先生。
 4. 访问新界乡议局。
 5. 访问香港大学。
 6. 参观印刷厂。
- 封底:访问文汇报社。左四为该报总编辑刘再明先生,左三为副总编辑刘永碧先生。

封三照片说明:

1. 与澳门大学预科部主任、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允中博士(左三)合影。左二为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所长郑佩玉教授,右二为雷强教授,左一为周运源副教授。
2. 港澳研究所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由郑天祥教授(左三)带队,于 1994 年 4 月考察正在建设中的珠海市横琴岛。
3. 1994 年 11 月 12 日,应邀参加中山大学校庆活动的澳门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委员吴志良先生(中)、澳门政府立法议员唐志坚先生(右三)等一行四人,与港澳研究所研究人员座谈合作研究事宜。
4. 1994 年 9 月 19 日,国家计委信息中心主任江春泽同志(右二)来港澳研究所座谈香港经济问题。
5. 香港利丰集团向中山大学国际贸易金融系和港澳研究所国际贸易班学生赠书暨颁授“利丰奖学金”仪式,于 1994 年 6 月 20 日举行。

(图片说明见 64 页)

